

# 1980 年代以來台灣文化民族主義的發展：

## 以「台灣（民族）文學」爲主的分析

蕭阿勤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籌備處

（研究論文）

本文以支持台灣民族主義的文學作家與批評家建構「台灣（民族）文學」概念的過程爲例，分析 1980 年代以來台灣文化民族主義者的文化論述發展，並探討他們在台灣民族主義政治發展中的角色。本文指出，本省籍文學作家與批評家的台灣文化民族主義主要是「美麗島事件」之後，政治反對運動人士進行民族主義意識型態動員所催發出來的。他們的台灣民族認同並非早已存在的認知要素，而是受政治變遷激發的意識，是在台灣過去二十年左右的特殊政治社會環境中才逐漸浮現。這種過程顯示台灣民族主義運動的發展序列，並不符合一般所認爲的民族主義運動進程的三階段論。黨外政治反對運動人士在 80 年代初提倡以一個相當於台灣島嶼領土範圍的新國家，取代依照中國民族主義與大陸疆域所組織的中華民國。支持台灣民族主義的人文知識分子的角色，則在創造台灣人集體象徵、重新詮釋台灣文學（以及復興福佬台語、改寫台灣歷史）等，以建構台灣民族認同感，支持政治上的認同主張與行動。

**關鍵字：**族群政治、民族主義、文化民族主義、台灣文學、知識分子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ncept of "Taiwanese national literature" by nationalist writers and literary critics, who have played a central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ese cultural nationalism since 1980. 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Taiwanese cultural nationalism emerged as anti-KMT activists mobilized intellectuals following the Kaohsiung Incident of 1979. This historical sequence shows that the Taiwanese nationalist movement does not fit prevailing conceptualizations of the history of nationalist movements that are based primarily on Miroslav Hroch's three-phase division. The paper also argues that the politicized identity of Taiwanese cultural nationalists is not a fixed, essential entity, but an effect of specific sociopolitical changes in post-1980 Taiwan. Taiwanese political dissidents' ideological mobilization has focused on substituting a new state corresponding with the island territory for the ROC framed according to Chinese nationalism and the Mainland domain. The work of articulating a sense of Taiwanese national identity has been left primarily to such pro-independence humanist intellectuals as writers and literary critics. These humanist intellectuals try to authenticate the political assertion of identity by creating collective symbols and reclaiming a particular national tradition of literature.

*Key words: ethnic politics, nationalism, cultural nationalism, Taiwanese literature, intellectuals*

台灣社會學研究第三期，頁 1-51，1999 年 7 月出版。

收稿：1999 年 1 月 26 日；接受刊登：1999 年 3 月 22 日。

---

台灣社會學研究：第三期（1999 年 7 月）目錄

[\[台灣文化民族主義的發展\]](#)（蕭阿勤）

[\[政黨認同的世代差異\]](#)（吳乃德）

[\[出生時平均餘命的長期趨勢\]](#)（陳寬政、劉正、涂肇慶）

[\[公營事業私有化符合誰的利益？\]](#)（張晉芬）

[\[女子髮廊中的雜誌閱讀行爲\]](#)（林鶴玲）

[\[一條畫不清的界線\]](#)（李國偉）

# 1980 年代以來台灣文化民族主義的發展：

## 以「台灣（民族）文學」為主的分析

蕭阿勤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籌備處

（研究論文）

本文以支持台灣民族主義的文學作家與批評家建構「台灣（民族）文學」概念的過程為例，一方面分析1980年代以來台灣文化民族主義者的文化論述發展過程與性質，另一方面探討當代台灣文化民族主義者在台灣民族主義政治發展中的角色。後者的分析工作一部分固然在於探討文學作家與批評家（同時也包括藝術家、歷史學者、民俗研究者、語言運動者）等人文知識分子何時、如何投入台灣民族主義政治，但另一部分則有賴對他們的「台灣文化」論述的發展過程與性質進行了解，而「台灣（民族）文學」論述則為整體的「台灣文化」論述的重要成分。

1980年代以來，台灣文化民族主義不只出現在文學、語言、與歷史的領域，而且也出現在其它文化活動的範圍，譬如藝術。<sup>1</sup>然而就台灣文化民族主義的發展而言，其它領域的重要性遠不如上述的三個領域。從1980年代初期開始，建構台灣文化「特殊性」的文化/政治活動的重心，主要就在文學、語言、與歷史方面（Hsiau 1998）。本文探討的焦點，即在文學部分。

### 一、族群，民族主義，與人文知識份子

#### （一）被宰制族群與民族主義

本文所謂的民族主義，採用的是Ernest Gellner的定義，亦即民族主義主要是一種政治原則，這種原則主張政治單位的界線與民族單位的界線應符合一致。在這種定義下，民族主義情感是違反或達成這種原則所引起的憤怒或滿足感，而民族主義運動則是受這種情感所激勵的運動。Gellner在界定民族主義時也指出，有一種違反民族主義原則的特殊情形，是民族主義者所特別無法忍受的，亦即政治單位的統治者與做為人口大多數的被統治者分屬不同的民族，譬如民族區域被納入大帝國，或者在自己的民族區域內受異族宰制的情形（Gellner

1例如謝里法（1994）；羊文漪（1995）；黃海鳴（1995）。

1983:1)。從台灣民族主義者的觀點來看，戰後台灣的政治發展，正屬於這種特別無法忍受的、違反民族主義的政治合法性原則的例子。從他們的角度來看，挑戰中華民國的政治架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台灣的主權宣稱，並且拒絕兩者所代表的中國民族主義，所反抗的是外省人、中國人的宰制，並且追求族群、民族單位界線（本省人、台灣人）與政治單位的界線（一個獨立的台灣國）的符合一致。

就歷史個案的比較而言，適合與戰後台灣政治發展與台灣民族主義意識形態進行參考對照的，應該是相對於統治的族群團體而處於政治、社會、文化不利地位的被支配族群團體所進行的民族主義運動。19世紀、20世紀初中、東歐被宰制的族群團體與20世紀被殖民地地區的民族主義運動正是這種例子，至於西歐主要民族國家早期形成的過程則不屬於此類。就研究台灣文化民族主義發展與做為文化菁英的人文知識分子在台灣民族主義發展中的角色來說，中、東歐被宰制的族群團體的民族主義運動與國家形成的過程，尤具有歷史比較上的相關性。中、東歐與西歐現代民族發展時所立基的社會、政治情況並不相同。在西歐的大部分地方，如英國、法國、西班牙、葡萄牙、瑞典、荷蘭，但也包括更往東的波蘭，早期現代國家或者採取專制主義的統治形式，或者採取等級代表議會制的形式，但都是在單一族群文化的支配下發展。大多數上述的地區，以往的封建政體因改革或革命而相繼轉型為現代的市民社會，同時民族國家理念上做為平等的公民所組成的社群 也被建構起來。至於大多數的中、東歐地區，外來的統治階層支配了當地的族群團體。這些族群集中在明確的地理區域，但沒有他們自己的統治組織、或者持續的書面文字的傳統（Hroch [1993]1996:79-80）。與戰後台灣國民黨統治下本、外省人族群不平等的社會政治狀況具有比較上的相關性的，是上述中、東歐的例子。如同19世紀、20世紀初中、東歐被宰制的族群團體的民族主義運動一樣，給台灣民族主義的政治動員提供現成基礎的，正是族群的差異與不平等。

## (二)民族主義與人文知識份子

上述歐洲現代民族發展的兩種政治、社會、與族群基礎，造成歐洲現代民族形成的兩種途徑，而其民族形成所憑藉的主要機制，以及在其中扮演領導角色的社會團體也因此不同。這兩種途徑的差異，也是Anthony Smith在他自70年代初以來一系列日益複雜的民族形成理論中，藉著「橫向族群社群」或「貴族族群社群」（lateral ethnies或aristocratic ethnies），以及「縱向族群社群」或「俗民族社群」（vertical ethnies或demotic ethnies）這兩個概念所要分辨的。Smith指出，在西歐的英、法、西班牙等地區，早期的現代國家是以「橫向族群社群」 亦即貴族階層 為基礎而發展的。貴族階層做為核心的族群社群，藉著現代國家科層統治的吸納能力（bureaucratic incorporation）這個重要機制，逐漸將較低階層的民眾與邊遠地區整合納入國家的統治下。Smith認為，經由這樣的機制，貴族階層將他們的族群文化 最重要的是祖先歷史與文化認同的觀念與感受，亦即關於祖先與文化源流的神話、記憶、象徵、與價值 擴展到不同的階層與地區，而形成民族的認同概念。至於在東

歐、中東、東南亞、與非洲部分地區，現代民族發展的基礎多半是「縱向族群社群」，亦即受大帝國統治或被殖民的族群社群。這些地區和西歐不一樣：國家是當地被支配的族群社群政擊的對象與文化上的外來者。Smith指出，主要是這些族群的人文知識分子提供這些族群發展民族認同所需的文化架構，以及改變政治現狀的動力。這些知識分子藉著重新挖掘、詮釋族群歷史等重要方法，將既存的族群文化要素轉化為民族文化的架構，提供民族奮鬥的道德意涵與方向指引，甚至藉以建立民族的行為典範，以提倡民族成員心靈的淨化與道德的提升。這種挖掘、詮釋族群歷史的工作，界定了民族發展的系譜與目的，因而建構一種歷史與命運的共同體的認同概念（Smith 1986, 1989, 1991）。

雖然Smith的研究只是關於民族起源與民族認同發展的許多理論之一，但他指出族群界線劃分了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地區，人文知識分子對被統治族群發展民族認同的相對重要角色，這一點對探討台灣文化民族主義而言，相當有啟發性。

雖然我們很難將民族主義與族群性（ethnicity）完全區分開來，並且在中、東歐與其它被殖民地地區，族群差異與不平等的確提供了民族主義政治動員的現成基礎，不過把民族主義簡單地解釋為族群性的延續是不恰當的。<sup>2</sup>這兩種集體認同類型之間關鍵性的區別，在於它們與國家的關係。在民族主義的意識型態中，民族被視為一個政治社群的基礎，是主權的依據，然而這種概念並非族群性定義的重點（Calhoun 1993:235; Cornell and Hartmann 1998:37）。一個典型的民族主義者會認為國家政治統治的界線應該與民族的界線重疊一致。不過絕大多數的族群團體並沒有企圖要建造一個代表自己的國家。從族群到民族，一個民族主義意識型態的發展，往往涉及一種論述的跳躍——從基於族群文化特殊性而堅持追求平等的公民權，跳躍到基於獨特的民族文化而企圖建立一個新國家。在台灣，本省人長久以來不僅被外來者視為種族上與文化上的中國人，多數的本省人本身也如此認為。在這種情況下，台灣民族文化特殊性的建構，對台灣民族主義爭取群眾的支持而言，就益形重要。這種民族主義文化意識形態的建構，主要就依賴支持台灣獨立的人文知識分子的文化活動。

<sup>2</sup>大多數致力於分析民族認同、民族主義、與相關現象的「現代性」的學者

Anthony Smith 稱之為研究民族主義的「現代主義者」（modernists）的主要工作之一，就在於說明民族主義無法用先前既存的族群來解釋，譬如 Hobsbawm（1990, Chapter 2）。相對地，Smith 是強調族群性對民族性（nationality）之重要的一位主要的學者，見 Smith（1986, 1989, 1991）。雖然 Smith 也肯定民族的確為現代的現象，而非原初的、自然的實體，但他認為許多的民族都含有前現代的（pre-modern）的族群要素。就某種意義而言，可以說 Smith 大部分著作的主要目的在提供民族起源的一般性解釋，但更重要的則在解釋民族主義的文化/政治訴求為何對人們具有如此強烈的吸引力。對 Smith 來說，民族主義的強大力量，主要來自其族群的內涵，亦即其文化的、心理的要素。見 Smith（1991:vii, 96）。筆者接受 Smith 在這一點上的看法，不過認為同樣重要的是要區別族群性與民族主義對政治訴求與行動之正當化的不同效果。在正當化政治訴求與行動時，一旦被整合成為一套民族主義論述的一

部分，族群的要素可能扮演和它們在非民族主義的族群政治運動中非常不同的角色。參考John Breuilly對Smith研究取向的批評（Breuilly, [1994]1996:150-153）。Breuilly認為，民族相關現象的一個極其顯著的特徵，是前現代（pre-modern）的族群性與現代的民族認同之間的不連續。

作家、藝術家、歷史學者、語言學家等等之類的人文知識分子在民族主義運動發展中角色，幾乎是不可或缺的。目前研究民族主義的文獻可謂汗牛充棟，不過有系統地分析人文知識分子在具體的民族主義運動中所扮演的角色的研究卻相當稀少。<sup>3</sup>將台灣反國民黨統治的運動從一個追求本、外省人平等的族群政治行動，轉化成追求一個獨立國家的民族主義政治行動，除了靠政治反對運動領導者所創造的象徵與修辭之外，一群支持台灣民族主義的人文知識分子所從事的文化活動也扮演重要的角色。在文學、語言、歷史領域所表現的台灣文化民族主義，是受政治反對運動對國民黨統治的挑戰所激發的，不管是建構一個文學傳統、企圖復興某種本土語言，或是形塑對歷史過去的新認識，這些知識分子的文化活動對某種特殊的台灣民族意識的發展，以及對台灣民族主義運動影響的深化，都非常重要（Hsiau 1998）。目前現有對台灣民族主義的研究大多數著重在政黨政治活動，而本研究不同的是針對一群文學領域的民族主義文化菁英及其活動，分析其台灣（民族）文學特殊性的意識形態如何發展，及其在政治變遷中的角色。

在本文中，「文化民族主義」用來指稱做為文化菁英的人文知識分子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與文化活動。通常他們組織非正式的、權力並不集中的文化或學術社團或刊物，試圖激發民族成員對民族社群的熱愛，而其主要的方法是教導這些成員認識其特殊的民族文化的共同遺產。一般而言，文化民族主義停留在小規模的運動，無法超越受教育階層參與的範圍（Hutchinson 1987:12-17）。然而在不少民族主義運動中，人文知識分子同時也成為政治領導者，尤其在民族主義群眾動員的早期（Hann 1995:106）。

<sup>3</sup>少數的專注於這方面的研究，包括Hutchinson（1987）；Yoshino（1992）；Royce（1993）；Hann（1995）；Aberbach（1997）。

### （三）人文知識分子與民族主義運動的階段發展

另一個涉及人文知識分子活動的重要的民族主義研究，是捷克學者Miroslav Hroch在60、70年代之交出版的著作。<sup>4</sup>Hroch的著作至今仍是對歐洲（尤其是中、東歐）被宰制的族群形成民族的過程最重要的歷史比較研究之一。Hroch根據民族運動不同階段中主要行動者的性質與角色，以及非宰制族群的民族意識發展的程度，將民族運動區分為三個階段或時期。<sup>5</sup>其中開始的階段A的特色主要是一群個人——通常是知識分子——展現對自己族群語言、文化、社會、歷史特質等的覺醒與興趣，並且積極熱情地探究與傳播。這些個人幾乎沒有特殊的政治目的，而他們的活動也對社會沒有廣泛的影響。在接下來的階段B所出現的另一類民族運動推動者，已不滿於上一階段停留在知識層次的歷史文化探索，因此積極地致力於鼓吹民族意識，逐漸動員更多的族群成員支持其締造民族的計畫。至於到了階段C，則前一階段推動者的鼓吹已有明

顯成效，使相當大部分的族群成員建立一定程度的民族認同，因而興起群眾性的民族運動（Hroch 1985:22-24; [1993]1996:81）。Hroch對民族運動發展三階段的區分為不少學者所接受，或者被借用來研究其它的歷史個案（譬如Gross 1981; Hobsbawm 1990:12, 104; Kellas 1992; Eley and Suny 1996:16-18; Woolf 1996:23）。

雖然Hroch指出民族形成的過程並非預先就注定或不能逆轉，而且這種過程可能中斷，也可能再度繼起，而不同的民族運動所歷經的

4 Hroch在這方面的兩本重要著作的主要部分已英譯並且合為一書，見Hroch（1985）。

5 這裡必須指出Hroch不用「民族主義」，而用「民族運動」（national movement）來指稱19世紀或20世紀初中、東歐的民族形成過程。亦即被宰制族群企圖建立民族文化、追求公民權與政治自決權、建立自己的統治階層的有組織的行動。因為這些有組織的行動的最終目標未必都在建立獨立的國家，而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是「民族主義」一詞在定義上所涵蓋的。見Hroch（1993）1996:80-81。然而就本文分析的目的而言，Hroch對「民族運動」與「民族主義」的區分，相對上並非很重要，因為他研究的某些「民族運動」的個案的確企圖建立自己的國家。

上述三個階段也有長有短，民族文化的探索、民族意識的鼓吹、與群眾性民族運動的強度也有強有弱（Hroch 1985:178; [1993]1996:79），不過他以這三個階段為架構，比較了19世紀或20世紀初挪威人、捷克人、芬蘭人、愛沙尼亞人、立陶宛人、斯洛伐克人、比利時佛萊明人（Flemish）、與日德蘭半島Schleswig地區丹麥人等八個民族運動個案後，明白地指出：現代民族或者說民族運動的發展，都始於通常是知識分子所進行的族群語言、文化、歷史等的熱情探究，而這種活動與結果為後來民族認同的建立，打下了基礎（Hroch 1985:22; [1993]1996:84）。

John Hutchinson研究愛爾蘭民族主義運動時發現，建立現代愛爾蘭民族國家的，是文化民族主義的支持者，而非形成權力集中的政治團體以動員群眾的「政治民族主義」者（Hutchinson 1987）。因此他明白地指出，「當代世界中爭取民族獨立與建國的過程，在每一個地方都是以逐漸浮現的文化民族主義運動為前導」，而這種逐漸發展的文化民族主義運動呈現的是歷史的/文化的復興的形式（Hutchinson 1987:2）。譬如說，在沙皇統治下的俄國，一群猶太作家在1881到1917年間所創造的希伯來文學傳統，催生了猶太復國主義與以色列國，希伯來文學因此成為當代猶太民族主義發展主要的文化催化劑。類似的情況有哈布斯堡帝國下的斯洛伐克文化民族主義、奧圖曼帝國下的希臘文化民族主義，以及不列顛帝國下的愛爾蘭文化民族主義（Aberbach 1997）。

然而台灣的情形卻有所不同。本文指出，整體而言，具有政治異議傾向的本省籍文化菁英投入台灣民族主義運動的時間，要比政治反對人士晚。主要是因為台灣政治反對人士在1980年代上半葉對國民黨政府所進行的民族主義式挑

戰，才激發本省籍文學作家與批評家的台灣文化民族主義，<sup>6</sup>亦即政治反對人士先於人文知識分子而成為民族

<sup>6</sup>同時包括歷史研究者、民俗研究者、語言復興運動者等的台灣文化民族主義。參見筆者博士論文（Hsiau 1998）第五、六章。

主義運動的主要推動者。從民族主義在世界史上發展的角度來看，上述的事實反映的是台灣民族主義做為歷史的「晚進者」（latecomer）的特殊性質（見下文分析）。此外，文化菁英參與民族主義運動的時間較晚，同時也顯示他們的台灣民族認同並非如同這些文化菁英不斷地宣稱，而且許多學者所以為的那樣始終早已存在的一種認知要素，而如同埋藏在泥土中的種子，只待適當的條件就可以發芽茁壯。相反地，這種認同應該視之為受政治變遷激發的意識，是在台灣過去將近二十年左右的特殊社會政治環境中才逐漸浮現的（見下文分析）。

#### （四）「文化特殊性」的政治

民族主義的核心要義之一，是以一特殊的文化的團體認同，做為政治要求與行動的基礎。「不管我們談的是民族主義的那個面向，也不管民族主義可能採取的是那種形式，民族主義的公分母包括一種信仰亦即一群人認為他們是獨特的社群，具有與眾不同的特徵以及一種意志亦即這群人希望在一獨立自主的國家中維護並宏揚這種特殊性」（Yoshino 1992:6）。也就是說，要宣稱有權擁有某片領土，並有權做政治自決，一群人通常必須令人信服地顯示他們是一個獨特的社群。關於文化的種種概念（譬如文化做為一種特殊的生活方式這種概念），一直被用來正當化民族自決的主張。文化於是被用來「確認」一個特殊人群的存在，而這群人有權決定他們自己的政治前途。就這一點來說，文化成為獲取政治權力的工具（Penrose 1995），文化領域因此包涵了對政治秩序至關重要的種種過程。民族主義者主張存在有一個獨特的文化，主要牽涉到集體象徵的生產，以及歷史記憶與文化傳統的再現（representation）。正如Pierre Bourdieu所指出，政治鬥爭基本上涉及「對社會世界的再現」，而這種再現是「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表達與建構」的（Bourdieu 1985:723, 726）。Prasenjit Duara研究中國1920年代初聯省自治主張中對中華民族概念的變化時指出，民族主義是「關於文化的政治」（Duara 1993）。不過確切而言，民族主義是「關於文化特殊性的政治」。在涉及文化特殊性的民族主義政治中，

人們自覺到他們「擁有」一個文化，文化被視為一種權利。然而民族主義者努力要恢復的那種文化傳統，往往與他們的父祖輩生活於其中的那種文化，具有不同的內涵與功能。他們的父祖輩極少將文化視為一個可以與他們自己、與他們的生活分離的客體。換句話說，在民族主義的文化政治中，已經喪失文化的無知無邪（cultural innocence）（Eriksen 1992:10）。

論述，或者說語言的陳述運用，對了解台灣文化民族主義建構族群性或民族性極為重要。做為製造與複製人們感受的一種社會過程，論述的行為建構它們自己的知識對象，創造它們自己的認知主體，並且決定什麼是理性的、正確的、以及真實的（Foucault 1972）。本文的分析顯示，論述 或者說言語的運用、流通、與循環反覆 在建構台灣民族認同時扮演關鍵的角色。如同 Denis-Constant Martin所說的，

關於認同的敘事引導了政治情感，使政治情感可以激發種種作為，以改變權力的分配；認同敘事改變人們對過去與現在的感受；它改變人群的組織方式，並創造新的人群；它強調某些特質，並牽強附會其意義與邏輯，藉此改變文化。認同敘事創造對世界的新的詮釋，以便改變世界（Martin 1995:13）。

在政治運動中宣稱某一種認同，或是將認同的宣稱做為政治主張的一部分，通常是藉著界定差異，亦即劃分「我們」與「他們」，而清楚有力地表達出來。人群之間的同與異，一方面在象徵上藉著再現的行為標誌出來，另一方面則在社會上藉著納入或排斥某些人群而劃分出來（Woodward 1997:4）。文化特殊性的建構與表述正可以用來劃分「我們」與「他們」 譬如在台灣民族主義的例子中的「我們台灣人」與「他們中國人」。雖然社會中具優勢地位的、宰制的團體也經常以某種認同宣稱做為正當化社會政治行動的基礎，但認同政治主要涉及的，

是宣稱自己為被排擠或被壓迫團體的成員，並以此身分與認同做為政治行動在道德上的正當化理由。關於文化特殊性的論述經常就著重在分析某個人群所遭受的特殊迫害，並且謳歌該人群與周遭互動的其它團體不同的獨特性。就像本文下面的分析所顯示的，獨特的台灣（本省）人歷史經驗 尤其是台灣（本省）人受不同的外來政權殖民統治並且反抗的歷史 的建構與表述，是台灣文化民族主義中「台灣（民族）文學」論述的一個重要部分。

80年代上半葉台灣的政治反對人士開始進行民族主義的政治動員（王甫昌 1996），這個時期大致上可以看成是Hroch所區分的民族運動的B階段，亦即在這個時期政治活動分子積極鼓吹民族意識，逐漸動員更多族群成員的政治支持。80年代末以來，許多本省籍的文學作家與批評家宣稱他們在60年代之後的文學活動與結果，是基於具有政治意味的台灣意識的覺醒，並且激發後來的台灣政治反對運動。<sup>7</sup>換句話說，在這些台灣民族主義者的歷史敘事中，他們本身早期的文化活動，無疑扮演Hroch所謂的階段A的角色，甚至這些活動早已具有政治動機。然而從目前留存的史料來看，實情恐非如此，而這正是本研究接下來要詳細分析的。<sup>8</sup>

7這種說法，譬如白萩（1989）；陳千武（1989）；李敏勇（1991）；彭瑞金（1993）。見下文第二節、第四節的分析。

8許多研究者可能認為70年代「回歸鄉土」的文化潮流也扮演類似Hroch所謂A階段的角色，亦即這時期許多知識份子對台灣的文化與歷史的熱切關懷與探究，替80年代的「台灣意識」或甚至台灣民族主義的發展奠下基礎。然而從史料所顯示的回歸鄉土的文化潮流的本質，以及從歷史分析的角度來說，上述的看法都是值得商榷的。首先，回歸鄉土的文化潮流主要代表的是對文化過度西化的反抗，而且是受到70年代初台灣外交挫敗所引起的社會政治改革呼聲激發的。以其中居於關鍵地位的「鄉土文學」作家與支持者為例，他們以中國的「國恥」來理解台灣戰後的社會政治問題，展現了鮮明的中國民族情感。在這個時期，「鄉土精神」雖有強烈的地方色彩，但絕不是台灣民族主義的。因此籠統地把鄉土文學為代表的70年代的文化活動與結果，視為台灣民族主義發展的A階段，並不恰當。參見筆者博士論文（Hsiao 1998）第三章的分析。再者，從歷史分析的角度而言，認為70年代回歸鄉土的文化潮流奠下80年代台灣意識或甚至台灣民族主義發展的基礎，這種回顧的看法恐怕無意中具有「歷史進化論」的意味。回歸鄉土的文化潮流中，確實存在著對台灣歷史文化的熱切關懷與探究，但這些情感、意志、與行動，未必會發展成有政治意味的台灣意識或甚至台灣民族主義。本文毋寧更重視「歷史偶然」造成的歷史轉折與影響。就本文的分析而言，最主要的歷史偶然，是美麗島事件的發生。

## 二、《笠》•《臺灣文藝》•與本省籍作家：60年代

在1950年代，就人數與知名度而言，本省籍的作家在文壇處於相當邊緣的位置。那些在日本殖民晚期建立一定聲譽的本省籍小說家，譬如吳濁流（1900-76）、楊逵（1905-85）、張文環（1909-78）、龍瑛宗（1910-），與呂赫若（1914-47），因為不同的原因，都已淡出文壇。在這十年左右，大概只有鍾肇政（1925-）等十位如今被稱為「戰後第一代的台灣小說家」執著於寫作。9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他們的平均年齡是二十歲，並且都接受過殖民時期下的教育而通曉日文，但戰後則都自學中文。一般而言，他們在殖民時期都少有寫作經驗，直到戰後50年代初才開始其文學生涯。10這群小說家不僅與殖民時期台灣人發展的文學傳統有了斷層，對中國大陸五四時期之後的文學發展，也少有所知。他們以自學的中文寫作，專注於自己熟悉的、生活周遭的題材，因此發展出樸實、平淡的作品風格，幾乎沒有什麼文學的、或甚至社會政治的意識型態上的特殊關懷（葉石濤 1984:139）。11

與上面這些小說家比較，當時的本省籍詩人則與外省籍作家有較多的來往。那些在殖民時期就開始寫作的本省籍詩人，與同輩的小說家一樣，幾乎已退離文壇。然而與「戰後第一代台灣人小說家」有相似教育背景的三位本省籍詩人，吳瀛濤（1916-71）、林亨泰（1924-）、

9這群小說家包括陳火泉（1907-）、李榮春（1914-）、鍾理和（1915-1960）、施翠峰（1923-）、鍾肇政、鄭煥（1925-）、廖清秀（1927-）、許炳成（文心，1930-），與林鐘隆（1930-）。

10兩個例外是陳火泉與鍾理和。前者在戰爭期間寫作並獲得日本芥川文學獎的候補，後者曾至中國，並於1944年開始以中文寫作。

11舉例而言，在這些小說家之間發行的《文友通訊》（1957年4月・1958年9月）上的簡短討論，顯示他們對「方言文學」少有興趣，視國語的使用為當然，認為以「台灣方言」寫作是沒有必要的。其中只有鍾肇政對方言文學還抱持正面態度，認為方言的使用應該是台灣文學的特色中重要的一環。見《文學界》1983,5:135-136。

與錦連（1928-），則加入外省籍的紀弦（1912-）所領導的「現代」詩社。在國民黨統治之下成長並受教育的更年輕一代本省籍詩人，譬如林宗源（1935-）、白萩（1937-）、李魁賢（1937-）、黃荷生（1938-）、薛柏谷（？），也投稿給現代詩社的刊物《現代詩》。林亨泰、錦連、與白萩後來也加入以外省籍詩人為主的「創世紀」詩社。一般而言，在50年代，上述的本省籍詩人與大多數的外省籍詩人相似，都在追求紀弦所提倡的「中國詩的現代化」。

#### （一）《笠》與《臺灣文藝》：現代化意識與中國意識

在1964年四月，吳濁流得到巫永福（1913-）、陳千武（1922-）、張彥勳（1925-）、葉石濤（1925-）、鍾肇政等一群本省籍作家的支持，創辦了《臺灣文藝》（以下簡稱《臺文》，1964-）。在這一年的三月，十二位本省籍詩人，包括吳瀛濤、陳千武、林亨泰、錦連、白萩、黃荷生、趙天儀（1935-）等，組織了「笠詩社」，並在六月開始發行《笠詩刊》（以下簡稱《笠》，1964-）。從那時候開始，《臺文》與《笠》這兩份刊物糾合了大多數的本省籍作家，包括在殖民時期成長者與戰後的世代。從80年代下半葉起，這兩份文藝刊物的作家與文學批評者成為推動台灣文化民族主義的主力，而80年代末之後，這兩份刊物的誕生更被形容為50年代「戰鬥文藝」宰制後台灣文學的復興。在他們的文學論述中，這兩份刊物的創辦，標誌著台灣民族意識在本省籍作家中的重大發展。這兩份刊物被認為在台灣「民族文學」中扮演關鍵角色，特別是因為它們彌合了戰前與戰後世代本省籍作家之間的斷層。因為這兩份刊物在台灣文化民族主義者的台灣文學論述中的重要性，因此有必要探討它們早期的歷史，特別是《笠》的發展。

《臺文》創刊號最引人注意的地方是吳濁流提倡漢詩——亦即中國古典詩的寫作（吳濁流 1964a），這和50、60年代流行的文學現代主義形成鮮明的對比。和許多在日本殖民時期成長的本省籍知識分子一樣，吳濁流不只接受正式的殖民教育，而且在私塾學習漢文。除了習於以日文寫作小說之外，他同時也寫中國古典詩。在《臺文》創

刊號的一篇文章中，吳濁流不滿胡適過分偏袒白話詩文，以及胡適對仍然寫作古典詩者的敵意。他同時批評當時台灣的現代詩受到外國文化影響而產生，尤其是模倣、使用西洋句法與形式。他認為中國古典詩是漢/中國民族文化的精華，「可與民族共榮」，因此提倡其寫作技巧的改革，譬如放寬某些格律上的限制，以便使現代人易於習作。吳濁流同時也呼籲現代詩的作者放棄對西洋作品形式與技巧的依賴，「創造有中國文化格律的白話詩」。事實上吳濁流為《臺文》所設定的主要任務就在鼓勵作家「共建有中國文化格律的文藝」，「共同努力來推進中國文化之向上」。<sup>12</sup>吳濁流對中國文化的現代化抱持折衷調和論的看法。在60年代台灣，一般具有社會文化改革傾向的知識分子普遍抱持類似的觀點。因此他強調要兼採中國固有文化的長處，譬如中國古典詩，以及外來文化的優點，以創造「合乎時代的我們中國的詩」（吳濁流 1971:14）。雖然吳濁流也認為作家必須認識台灣的特殊環境，作品要立基於這種特殊性，亦即「台灣文藝，要根據台灣的特殊環境而產生一個個性」，但他也主張「這個性又要合於中國的普遍性，同時具備世界的普遍性，才有價值可言」（吳濁流 1964b）。

吳濁流在1976年10月，也就是「鄉土文學論戰」發生大約10個月之前逝世。直到他逝世，《臺文》都闢有專欄，刊載中國古典詩作。在吳濁流主編之下，《臺文》登載的作品主要來自本省籍作家，包括笠詩社的詩人，這本刊物於是成為本省籍詩人、小說家、散文家、與文學批評者發表作品的主要園地。雖然吳濁流個人有強烈的文學信仰，然而很難說《臺文》的作者有什麼特殊的關懷。至於70年代初「回歸鄉土」的潮流，對這份刊物也沒有特別顯著的影響。只有在吳濁流去世後，鍾肇政繼任為新主編，《臺文》才致力引介、批評黃春明（1939-）與楊青矗（1940-）等主要的「鄉土小說家」的作品。它也重新登載楊逵、張文環、龍瑛宗、吳永福，與葉石濤等本省籍作家在殖民時期所寫的小說。此外，鍾肇政主編下的《臺文》也開始出現一系列特輯，

<sup>12</sup>見《臺灣文藝》1964,5:1。

討論重要的本省籍作家，如鍾理和、鄭清文（1932-）、李喬（1937-）、以及鍾肇政本人。藉著向讀者介紹這些本省籍作家與作品，《臺文》表達了對「鄉土文學」的支持。

和《臺文》類似，《笠》成為本省籍詩人集中的園地。在60年代末，笠詩社的成員已超過三十人。除了一、兩位之外，他們都是本省籍。和《臺文》的作者相比，他們對詩有較為一致的看法。至於他們組成詩社的動機「目前詩壇……創作選稿之流於人情……以捧場或漫罵代為正當批評……針對其弊病，籌組出版一夠水準的，慎重其事的詩誌，以挽救目前詩壇之頹廢現象」（陳明台 1969:21），並沒有極其特殊之處。《笠》創刊號上同時以充滿自信的語氣宣稱「五四」對他們而言，已不再有什麼意義，因為「這個世代終於有了屬於這個時代的詩」。<sup>13</sup>因此笠詩社成員在1980年代之後宣稱《笠》的創辦與《臺文》的出現一樣，都是基於一種與「中國意識」對立而自主的「台灣意識」，<sup>14</sup>實情則遠非如此。這本刊物呼籲創作並謹慎評價「屬於這個時代的中

國詩」，以「保存民族文化與幫助讀者之鑑賞」。

我們甚至很難說笠詩社的成立，是出於決心抵抗台灣現代詩嚴重的「西化」。15對於從1959到1969年影響一般詩人甚鉅的文學現代主義的主要推動者創世紀詩社，笠詩社很少有抵抗的具體表現。《笠》甚至向其讀者正式推薦《創世紀》詩刊。16笠詩社成員幾乎未曾參與70年代初對台灣現代詩的批判，這可以視為他們對傾西方的文學現代主義少有具體反對的指標。在70年代中的鄉土文學論戰時期，如同一些資深的成員在那個時候所承認的，笠詩社在論戰中並沒有扮演什麼角色，而論戰對他們的創作也少有影響。17

13見《笠》1964,1:5。

14這種說法，譬如陳千武（1989）；白萩（1989）；並比較李敏勇較早的說法，見郭成義紀錄（1982:175）。

15譬如李敏勇的說法，見郭成義紀錄（1982:175）。

16見《笠》1966,13:10。

17這是趙天儀與李魁賢在當時的討論所指出的，見《笠》1978,87:43-43。至於白萩的看法，見《文學界》1982,4:182。

簡而言之，笠詩社的成立與《笠》的創辦，與《臺文》的誕生一樣，和政治的地域傾向幾無關係，更別說是出於台灣民族主義。相對地，這兩份刊物各自以不同的方式展現鮮明的中國意識。笠詩社對流行的傾西方的文學現代主義也少有刻意的抵抗。我們可以說，就像戰後二十年其它重要的詩社一樣，在當時流行的「現代化」意識之下，笠詩社關懷的是如何將詩現代化而創造「中國現代詩」。就這種熱情而言，他們和60年代主要由外省人組成的其它重要詩社沒有太大的不同。

## （二）《笠》、《臺灣文藝》、鄉土精神、與鄉土文學：一個巧合

使笠詩社和其它重要詩社有所區別的，主要是其成員較為樸實明朗的寫作風格，以及對處理日常生活題材的興趣。在一方面，和那些急於嘗試現代主義前衛的寫作技巧的詩人不同，他們刻意避免語意的模糊與西方意象的過度使用。這對成長於殖民時期而只在戰後自學中文的一代，尤其如此。用一種較為人熟悉的、不矯揉做作的方式寫作，也許是一種較可靠的辦法，讓他們可以清楚地表達意念，讓讀者易於了解。另一方面，和那時大多數耽於內在經驗的詩人相比，笠詩社成員較重視日常生活的題材。這種題材，就像他們樸實明朗的寫作風格一樣，使他們的作品比充滿現代主義技法的詩更有現實感，也比較容易讓人接近。正因為如此，雖然《笠》在鄉土文學的發展上幾乎沒有扮演重要角色，但是在鄉土文學流行時，《笠》被某些人認為具有「鄉土精神」（陳千武1975）。至於《臺文》，重要的資深小說家與文學批評家葉石濤早在1968年就

因為它「頗有鄉土色彩」而加以特別推薦（葉石濤 1968:37）。就像笠詩社的兩位重要成員在當時所指出的，《笠》的風格與鄉土文學的現實傾向「巧妙地，剛好合流」，「觀念相通，看法一致」，亦即在文化潮流的轉變中，兩者的契合是一種「偶然」。他們並且指出，其同仁詩作的「鄉土精神」缺乏社會、政治的意涵，和60年代末之後受重視的鄉土小說的鄉土精神並不一樣。

18

18這些是李魁賢與李敏勇的發言。見《笠》1978,87:43。

70年代受重視的鄉土文學主要作家是本省籍的陳映真（1936-）、黃春明、王禎和（1940-90）、王拓（1944-）與楊青矗，而外省籍的尉天驄則是重要的推動者。國民黨政府所攻擊並且引起論戰的，是這群作家與批評家。就像葉石濤後來所指出的，這群年輕的作家與吳濁流等老一輩本省作家已少有接觸，而他們的作品也與日本殖民時期台灣作家的「鄉土文學」幾無關連。總之，不管是《臺文》或《笠》，對60年代末與70年代初鄉土文學的發展都沒有顯著的影響。它們在回歸鄉土的潮流中，扮演相當邊緣的角色。 19

雖然鄉土文學的發展對笠詩社的創作少有影響，但鄉土文學逐漸受到重視，確實使其成員重新評價他們自己的組織與刊物的歷史意義，同時也使他們有更高的期望，要在70年代明顯轉變的文化環境中扮演較以往更重要的角色。在回歸鄉土潮流中，笠詩社逐漸強調其「現實主義」的傾向，而與「創世紀」、「藍星」這兩個主要詩社疏遠。當70年代初台灣的現代詩逐漸受到嚴厲的批評時，笠詩社明白地表達他們對創世紀詩社的「超現實主義」與藍星詩社新近的「古典抒情」傾向的不滿。在1973年四月與十月出現的《笠》的「卷頭言」，首先批評當時大多數詩人普遍不關心現實，接著重申他們對生活與社會現實的關懷，以及創作「在這一個時代的這一世代的詩」的熱情。 20

### （三）《笠》：臺灣現代詩傳統的捍衛者與中國意識

也就在這個時候，《笠》開始介紹殖民時期本省籍詩人的現代詩作，呼籲「經由傳統的再認識」，修正「詩學界已經迷失了的方向。」 21在一方面，從1972年十月起《笠》增加了一個不定期的專欄，介紹並討

19從這兩份刊物的銷售量來看，它們對鄉土文學發展少有影響的這個事實，就更加明顯。在鄉土文學論戰期間，笠詩社的重要成員李魁賢指出「《笠》詩刊發行範圍太小，沒有給予外界積極的刺激和影響。」見《笠》1978,87:43。至於《臺文》，從創辦到吳濁流逝世，並沒有國內的訂戶，只有免費寄送贊助者與國外機構。見《出版家》1976,52:71。

20見《笠》1973,54:1; 1973,57:5。

21見《笠》1973,57:5。

論王白淵（1901-65）、吳新榮（1907-67）、郭水潭（1908-）、巫永福等的現代詩作，試圖使讀者注意殖民時期本省籍詩人的成就。另一方面，笠詩社愈來愈強調殖民時期的文學遺產在促動戰後台灣現代詩發展上的重要性。紀弦曾經宣稱是他將現代詩的「火種」從中國大陸引進台灣，是台灣現代詩的先驅。<sup>22</sup>相對地，笠詩社強調在殖民時期，本省籍詩人已經從日本人那兒學習到源自現代主義、象徵主義、與超現實主義的許多西方現代詩技巧，因而建立了一個獨特的詩傳統。雖然沒有否認紀弦對台灣現代詩發展的顯著貢獻，笠詩社宣稱林亨泰等本省籍詩人將殖民時期的詩藝術帶入了紀弦所領導的現代詩社。他們強調，雖然殖民時期的本省詩人已經熟悉西方現代詩的藝術與技巧，但殖民時期的詩傳統最主要的特色是詩人對生活與社會現實持續一致的關懷。<sup>23</sup>

做為一個由戰前與戰後世代的詩人組成的團體，笠詩社逐漸把自己呈現為殖民時期以來發展的台灣現代詩傳統的捍衛者。再者，在流行的鄉土文學的背景下，笠詩社愈來愈謳歌簡樸的、不矯揉做作的寫作風格，以及對生活與社會現實的關懷，並且把這種風格與關懷形容為台灣現代詩傳統的本質。對他們而言，這種本質正是「鄉土精神」的核心，而他們自己的刊物《笠》和其他的詩歌期刊不同，是這種鄉土精神的唯一代表。<sup>24</sup>鄉土文學論戰剛結束不久，笠詩社即為自己設定了建立「本土詩文學」的任務。<sup>25</sup>和「鄉土」比較，「本土」在笠詩社的論述脈絡中，更清楚地指稱台灣，而非中國大陸。<sup>26</sup>笠詩社揭櫫「現實主義的藝術導向」為他們的寫作圭臬，宣稱藝術性、社會關懷、

<sup>22</sup>譬如見紀弦（1966:4）。紀弦於1929年在中國大陸時開始寫詩，不久他成為李金髮與戴望舒這兩位30年代重要詩人的崇拜者，而李、戴兩人深受法國象徵主義的影響。戴望舒是《現代》（1932-35）詩刊最主要的作家，紀弦也向這份刊物投稿，而被視為戴望舒所代表的《現代》團體的一員。參見紀弦（1966:3）；古繼堂（1989:124-125）。

<sup>23</sup>此種看法，見《笠》1977,81:41-42; 1980,95:54-57。

<sup>24</sup>見《笠》1978,87:5。

<sup>25</sup>見《笠》1978,85:77。

<sup>26</sup>因此李魁賢曾建議使用「台灣詩文學」，而非「本土詩文學」。見《笠》1978,88:43。

與鄉土精神的平衡發展是他們的基本原則。<sup>27</sup>笠詩社響應鄉土文學提倡者的看法，呼籲詩人創作一種能代表「我們的土地與我們的時代」的作品。<sup>28</sup>從1970年代中期起，「土地」與「寫實」就成為笠詩社經常運用的口號。

然而這個時期的笠詩社的地域傾向，和70年代鄉土小說家的地域傾向一樣，不應該加以過分誇大，甚至視之為與中國民族主義完全對立的分離主義。<sup>29</sup>就像本文上面提到的，笠詩社批判當時詩人不加反省的西化傾向，與對社會現實的冷漠，因而致力於介紹殖民時期台灣的現代詩遺產。在70年代台灣遭逢重大外交挫敗的背景下，笠詩社強調的是殖民時期台灣詩人的中國民族意識，以及對中國祖國解放台灣的渴望。巫永福在殖民時期所寫的兩首詩，*孤兒之戀*與*祖國*，特別被挑選出來做為這種情感的見證。<sup>30</sup>再者，前面也提到，笠詩社的成員既包括戰前世代的詩人，並且逐漸將自己呈現為殖民時期台灣現代詩傳統的捍衛者，同時笠詩社仍與一些戰後的日本詩人維持密切的關係，因此該團體曾被一些批評者抨擊為「日本詩壇的殖民地」。此外，笠詩社幾乎完全由本省籍詩人組成，而且關注本土/台灣的地域傾向愈來愈清晰，這些事實也招致一些懷疑。為了回應這些批評與懷疑，在1978年二月，正逢鄉土文學論戰逐漸停息之時，笠詩社的女社長陳秀喜（1921-91）如此說道：

我是個受日本教育的人，我可以用日本話，日本文字寫日本詩，但我為何卻辛苦的學中文寫中國詩呢？因為我不甘被殖

<sup>27</sup>見《笠》1980,97:1; 1980,100:1。

<sup>28</sup>見《笠》1977,79:1。

<sup>29</sup>參見本文「註8」。

<sup>30</sup>見《笠》1972,52:5-9; 1978,87:2-11; 1981,102:33-35。兩首詩原為日文。關於兩首詩在70年代初被譯成中文並發表的經過，見巫永福（1978）。〈祖國〉一詩中譯發表後，陸續被轉載，其經過見李魁賢（[1982] 1987:14）。趙天儀曾於1978年台北的「七七抗戰紀念會」上朗誦該詩，其經過與引起的熱烈回應，見李魁賢（[1982] 1987:14）；王曉波（[1987] 1988:240）。

民，我是中國人，「笠」詩刊當然是中國人的詩刊……我自己最痛苦便是被殖民過，我更加熱愛這個民族，熱愛這個鄉土……我身上流著的是中國人的血，我的文學也是中國的文學，我是中國人，我便走中國人的路，絕對不允許有人說我們是被殖民的。<sup>31</sup>

對笠詩社而言，「鄉土文化即是中國文化的一環」，因此「台灣文學」包括「光復前的台灣文學」，即使有其獨特成分，都是「屬於中國文學的一部分」。<sup>32</sup>就像笠詩社的兩位創社成員 林亨泰與趙天儀 所說的，他們所致力，不只是創作「現代詩」，而是「現代中國詩」；他們所希望成為的，不只是「現代詩人」，而且是「現代中國詩人」。<sup>33</sup>就像鄉土小說家一樣，笠詩社成員懷抱著鮮明的中國意識。

然而自1980年代初期之後，笠詩社和《臺文》的作者群已成為「台灣本土文學」做為一個獨特文學傳統這個概念的主要建構者。在80年代結束前後，「本土文學」的概念更進一步發展成「台灣民族文學」。對台灣民族文學的論述，構成了80年代中期以來快速發展的台灣民族主義的一個重要部分。台灣民族主義政治的發展，以及這種文學的政治化，主要是因為1979年高雄美麗島事件的刺激。

31見《笠》1978,83:55-56。在當時的政治高壓統治下，作家面臨官方的監控與文字獄，因此他們可能在寫作時自我設限、自我檢查，而未曾暢所欲言。作者並不否認有這種可能。在被懷疑有異端的政治與文化思想而遭受指控時，作家面臨身家之危，不得不奮起辯解，這種情形亦不難體會。正如同文中這段引言所顯示的那樣。然而在自我設限中流露或一時辯解下宣稱的「中國意識」，並不必然就是「虛假」的。就本文所依據的史料來看，《笠》與《臺灣文藝》兩團體絕大部分的作家在60、70年代的中國民族/國家認同，並非全為自我設限或一時辯解下「不得已」的「交心」，而是他們主觀上相當明確的自我認同的一部分。同時這樣的發現，也並不否認當時他們在作品中所表現的對臺灣本鄉本土的真情摯愛。但這種情感與他們的中國民族/國家認同並行不悖，並非提升到民族/國家的層次上，而與他們的中國認同相衝突。參見本文「結論」部分的討論。

32見《笠》1977,81:40-43。

33見《笠》1973,54:91-92; 1980,95:1。

### 三、台灣政治反對運動，台灣民族主義，與「台灣文學」

戰後二十年，國民黨政府在台灣成功地壓制了政治反對者。70年代初期，以黃信介為先驅的「黨外」團體開始推展台灣政治反對運動，追求中華民國政治體制內的「民主化」目標。美麗島事件是黨外的一大挫敗，使反對運動激進化，黨外激進派系開始挑戰國民黨政權的合法性，宣揚「台灣意識」。換句話說，反對運動在對抗的意識形態上，由要求特定族群（尤其是本省人）得到平等的待遇，走向準民族主義式的族群訴求，企圖建立新的民族國家（王甫昌1996:155-72）。

#### （一）美麗島事件與文學政治化：80年代上半葉台灣文學的「去中國化」

在80年代上半葉黨外雜誌的台灣意識論述中，70年代流行的鄉土文學開始和台灣的政治反對運動相提並論，兩者都被視為是長久發展而存在的台灣意識的自然產物。黨外台灣意識的提倡者認為，70年代整體經濟的發展與政治的動盪，已使以台灣為主體的台灣意識深入社會各層面。他們借用馬克斯主義上、下層結構關係的概念，認為鄉土文學與政治反對運動兩者都是台灣政治與經濟現狀的忠實反映。34這種說法的典型陳述，可以用《生根》（《深耕》系統的雜誌）上的一篇文章為例。這篇文章的作者說：

臺灣鄉土文學究竟是什麼呢？它的對象就是這一個被共同的政治經濟生活連結

在一起的台灣人民的生活，描寫他們所受

<sup>34</sup>譬如陳樹鴻（[1983] 1988）與施敏輝（陳芳明）（[1984] 1988，[1985] 1988）的說法。

的壓迫與不平，描寫他們的發展與前進。鄉土文學運動的動力是台灣意識對非鄉土文學的批判，並且在台灣實體的存在上建立起一個相對應的、反映客觀的文學世界。正如台灣鄉土文學運動是要在台灣實體的客觀存在上建立起一個反映現實的文學世界一樣，黨外的台灣民主運動也是要在同樣的客觀存在上，建立起一個相對應的民主政治。而推進它的原動力則是台灣意識，針對否定台灣現實的非民主體制的批判（陳樹鴻 [1983] 1988:198-199）。

在這種論述中，鄉土小說家與鄉土文學提倡者鮮明的中國意識幾乎完全被忽略，反之，鄉土小說家認識到台灣是主要的「鄉土」，則被刻意強調，而他們對中國民族主義議題的深刻關懷則未曾被提及。<sup>35</sup>當激進的黨外成員運用民族主義的原則，並且以建立新的民族國家來思考台灣的未來時，台灣意識開始被視為與中國意識無法相容。這種論述代表的是美麗島事件之後新近出現的黨外的台灣民族主義，而非鄉土文學主要作家與提倡者當時的想法。我們在80年代上半葉的黨外民族主義論述中看到的，是一種特殊的興趣正快速發展：亦即根據目前的關懷與期望而重新建構對歷史過往的認知。

當黨外激進成員開始將鄉土文學與黨外政治反對運動相提並論時，傾向於支持台灣獨立的本省籍文學作家與批評家也開始推崇葉石濤早期對本省籍作家與作品的評論，並將他的看法往前推進一步。對他們而言，葉氏1965年 大約鄉土小說受重視的十年前 出版的 台灣的鄉土文學 一文指出了「〔戰後〕第一代作家與〔殖民時期〕先行代作家一脈相連，香火不絕，台灣文學的潛流不斷……」（彭瑞金 1983:48）。至於葉氏1977年 台灣鄉土文學史導論 則因為指出台灣（鄉土）文學是以台灣意識為基礎，而被認為提供了「台灣文學」的絕

<sup>35</sup>參見本文「註8」與筆者博士論文（Hsiao 1998）第三章。

佳定義（宋冬陽 1984a:14-19）。<sup>36</sup>整體而言，在80年代支持台灣民族主義的文學批評者論述台灣文學時，基本上不出葉石濤上述兩篇文章的主要觀點。<sup>37</sup>然而在80年代這些文學批評者的推演論述下，葉氏在兩篇文章中強調台灣歷史、社會、文化、文學的特殊性，但又主張平衡文學表現中的台灣地方認同與中國民族認同的用心（Hsiao 1998:161-164），則被有意或無意地忽略。

## （二）美麗島事件與本省籍作家、作品的政治化

美麗島事件激發了文學的政治化，如同它導致了政治反對運動的激進化。事實上在鄉土文學論戰停息後不久，王拓與楊青矗這兩位主要的鄉土小說家就放棄其文學生涯而投入政治反對運動。兩人都成為1978年底中央民意代表增補

選舉的黨外候選人，但這次選舉因美國突然與台灣斷交而停辦。王拓與楊青矗後來加入《美麗島》團體，並且因為涉及美麗島事件而入獄。這個事件深深影響了《笠》與《臺文》作家，他們許多人明白承認這個事件使他們的政治意識覺醒，並且認識到國民黨統治的獨裁性格。資深的《臺文》成員鍾肇政明白指出美麗島事件之後的「台灣意識論戰」將他的台灣意識具體化的深刻影響。他說：

美麗島軍法大審之後，本土精神昂揚……於是乃有1983年到84年間的「台灣意識論戰」，打得如火如荼。……坦白說，我也是這場論戰的受惠者。這個時期，我退隱鄉間，對文壇事不再問聞，埋頭寫我的長篇小說。然而，原來存在於我心中的意念——一個台灣文學主義者的思念及嚮往，被那一場論戰具體化、理論化了，也被凝固了（鍾肇政 1989:333-334）。

36不過至少在70年代陳映真、黃春明等人的鄉土小說流行之前，葉石濤用「鄉土文學」一詞指稱從殖民時期到戰後當時所有本省籍作家的現代文學作品，以便與「中國文學」的民族傳統區分開來。因此葉石濤當時的「鄉土文學」概念與70年代之後流行的「鄉土文學」一詞所指不同。

37見葉石濤1965；（1977）1978。

長期以來是《臺文》作家，並且在1994年二月成為其總編輯的李喬（1934-），也曾清楚地表達了類似的覺醒：

大的時代變遷對作家是重要的，說來很可笑也很可恥，我自覺成長的很慢。我經常向三十多歲的寫作朋友講：我有十幾年的生命是停頓的，白活了十年到十五年；要不是時代的變化，可能我終其老死都不會「長大」。現在我想我是「長大」了。今天我知道自己想要什麼？想做什麼？能做什麼？我寫的是以台灣歷史為背景的小說，我是在社會的重大事件中找到焦點，大時代的衝突使自己的生命獲得衝激因而成熟，例如中壢事件、美麗島事件，讓我成長。不然的話，我可能終其生找不到生命意義的焦點，也就找不到文學的焦點。……我也曾高談藝術是獨立於現實之外，和政治是不接觸的……在台灣的作家顯然的要分出你是黑是白，是正義是不義；作家若還想「超乎政治之外」是可恥的，文學沒有政治是假的，尤其是當前的台灣作家（李喬，趙天儀 1988:30-31）。

另一位在鄉土文學論戰結束後成名，並且後來曾擔任《臺文》編輯委員的年輕一代本省籍作家宋澤萊（1952-），生動地描述了美麗島事件對他個人的重大衝擊：

一九七九年底恐怕是我們年輕人一個很重要的再啟蒙。我猶記得，在那之前，我還是多麼純粹的一個被瞞在世界真相底下的人。在那之前，我們都還思索人間究竟有什麼絕對的事？人性究竟是善是惡？何謂最終的信仰？社會的法則是什麼……但是那以後，我們突然改變了，只在一夜間，我們變成了另一個人。你看！多麼傻，我們的答案就在那兒，人類的真面目就呈露在那兒，而整個歷史的真相就是那樣，以前我們多愚蠢，而現在我們聰明起來了。 38

鍾肇政、李喬、宋澤萊的自白，分別代表戰後第一、二、三代本省籍小說家受美麗島事件的深刻影響。

這個重大政治變動的衝擊對笠詩社的重要詩人 譬如鄭炯明與李敏勇的影響也非常明顯， 39並且使《笠》與《臺文》作家開始觸碰各種敏感的社會、政治議題，譬如關於二二八事件的記憶，反共戒嚴下的社會生活、民族/國家認同的問題等等。從1980年代初開始，這些小說家與詩人的作品或者用隱微的筆法，或者用明白的方式，抗議國民黨的統治。就像當時擔任《臺文》社長的陳永興所指出的，受到黨外對國民黨挑戰的刺激，「……『臺灣文藝』，在尺度上也比過去的二十年有很大的突破，……沒有任何題材是不能寫的，沒有任何作品是不敢登的……。」 40笠詩社與《臺文》列名的「本社同仁」、社務委員、編輯委員、作者群等，幾無例外地由本省人組成，兩個團體作家作品中的抗議，無疑有強烈的族群政治的意涵。

《笠》與《臺文》兩個作家群長久以來維持密切的關係。自《臺文》創辦以來，笠詩社成員一直是重要的投稿作家與贊助者。吳濁流在1976年逝世後，笠詩社的資深成員巫永福，繼任為《臺文》的發行人。在1983年一月，《臺文》列名的「本社同仁」有46位，其中有13人即為笠詩社成員，包括笠詩社的兩位創社社員陳千武與趙天儀。 41在80年代上半葉，這兩個作家群開始與黨外發展公開的密切關係。楊青矗與王拓在1983年12月與1984年11月分別出獄後，都加入《臺文》而成為其「同仁」。《臺文》列名的「同仁」，還包括黨外重要的領

38引自高天生（[1985] 1994:258）。

39見鄭炯明（1987:8-9）；吉也（1988:101）。

40見《臺灣文藝》1984,91:32。

41見《臺灣文藝》1983,80：版權頁；《笠》1982,112:18。

導者如江鵬堅、周清玉、與洪奇昌。<sup>42</sup>在1984年九月，《臺文》策劃了一個專輯，歡迎因美麗島事件被捕的八位黨外領導者之一的林義雄被釋放出獄。<sup>43</sup>

1982年初，三位笠詩社與《臺文》的資深成員鄭炯明、曾貴海、與陳坤崙，在高雄創辦了《文學界》（1982-88）。在80年代，這份新的文學刊物與《笠》、《臺文》一起成為以笠詩社與《臺文》成員為主的本省作家、文學評論者發展與建構政治化的台灣文學概念的主要場所。

### （三）什麼是「台灣文學」？：入世精神，抵抗意識，與本土化

當笠詩社與《臺文》成員及其作品愈來愈政治化，「台灣文學」的定義這個議題對他們而言也愈來愈重要。承襲葉石濤的看法，台灣鄉土文學應該是基於台灣意識而寫出的作品（葉氏長久以來為《臺文》的重要支持者與投稿作家，並且在1983年開始列名為《臺文》同仁<sup>44</sup>），《臺文》年輕一代成員如彭瑞金（1947-）、陳芳明（1947-）與高天生（1956-）的文學評論，在80年代上半葉台灣文學概念政治化過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和葉石濤早期的看法比較，他們的論述呈現了將台灣文學「去中國化」的激進傾向，亦即強調台灣文學異於中國文學的歷史性格、文學特色等「本土化」特質，認為探討台灣的歷史命運與人民的生活風貌，才是台灣作家的最主要課題。<sup>45</sup>至於陳芳明則重新發掘葉石濤與陳映真在鄉土文學論戰時期所提出而被人忽略的相對觀點，認為葉石濤的「台灣（鄉土）文學」概念是基於健全的「台灣意識」，陳映真的「在台灣的中國文學」概念則反映不切實際的「中國意識」，而這兩種認同情感是無法並立的（宋冬陽 1984a）。

<sup>42</sup>見《臺灣文藝》1984,91：版權頁。

<sup>43</sup>見《臺灣文藝》1984,90:4-28。

<sup>44</sup>見《臺灣文藝》1983,80：版權頁。

<sup>45</sup>見高天生（1981）；彭瑞金（1982）；宋冬陽（1984a）。

這時期對台灣文學最完整的政治化定義，可能是李喬所提出的。援引葉石濤與彭瑞金的看法，李喬如此定義：

「所謂台灣文學，就是站在台灣人的立場，寫台灣經驗的文學」。所謂「台灣人的立場」，是指站在台灣這個特定時空裡，廣大民眾的立場；是同情、認同，肯定他們的苦難、處境，希望，以及追求民主自由的奮鬥目標的立場。這個立場，與先住民，後住民，省籍等文化、政治、經濟因素無關。

所謂「台灣經驗」，包括近四百年來，與大自然搏鬥與相處的經驗，反封建，反迫害的經驗，以及反政治殖民，經濟殖民，和爭取民主自由的經驗。（李喬 1983:7）

在這樣的定義中，葉石濤1977年《台灣鄉土文學史導論》中用來形容殖民時期台灣鄉土文學特質的「台灣意識」概念被推進一步，涵蓋了國民黨統治的

戰後時期，意味著戰後的台灣人。雖然李喬在此強調不分族群，和他們的祖先一樣，面對高壓的統治而展現抵抗的精神。對李喬而言，為台灣人而寫、寫關於台灣的事，是認同台灣的作家寫作的指導原則。

中國文學史家夏志清在分析現代（特別是1949年之前）中國文學的特色時，曾出現代中國作家的道德重擔，主要源自他們對中國國家/民族命運與前途近乎執念的深刻關懷（the obsession with China）（Hsia 1971:533-34, 536）。如果模倣夏志清的概念，那麼我們可以說，在80年代初，一種「對台灣的執念」（the obsession with Taiwan）已經在《臺文》與《笠》成員之間形成。他們對台灣的命運與前途的嚴肅關懷，使他們將70年代鄉土文學流行以來對文學實用功能與社會政治意義的強調推到極致。然而對台灣執著的關懷已取代在鄉土小說家身上復起的那種「對中國的執念」。他們同時也將自己描繪成鄉土文學的先驅，譬如認為鄉土文學乃源自笠詩社對生活與社會現實的特殊關懷。 46

#### （四）台灣人的形象

當《笠》與《臺文》成員以政治化的方式來界定台灣文學，他們同時也建構了台灣人做為不同外來政權壓迫統治的受害者的形象。清朝將台灣割讓給日本這個歷史事實，被強調成是祖國有意拋棄這個島嶼的鐵證。受吳濁流1945年所寫小說《亞細亞的孤兒》的激發，他們同時也將台灣人描繪成孤兒（彭瑞金1983；李喬1984；宋冬陽1984b）。對笠詩社與《臺文》的成員來說，小說主角猶如孤兒的可悲遭遇——殖民時期的台灣青年胡太明同樣受日本人、中國人的歧視懷疑、對中國情感的幻滅、最後回到台灣故鄉而發瘋——給台灣人的啟示就是：台灣人必須覺醒，認識到他們不是中國人，而是台灣人，而有如孤兒的台灣人必須建立自信。

在建構台灣人做為殘暴統治的受害者與被中國拋棄的孤兒這種形象時，《笠》與《臺文》成員也同時宣稱自己所屬的這兩個團體是台灣人的代言人。笠詩社成員開始宣稱他們是唯一能「站在台灣人的立場，寫出台灣心聲的詩人團體」，而他們的作品最能具現「台灣精神」，因而最能代表李喬所定義的台灣文學（杜國清1985）。同樣地，從1983年起，《臺文》封面上出現的口號是「擁抱台灣的心靈」，並且開始製作一系列的專輯，探討台灣語言、歌謠、歷史事件與人物等等，目的在增加讀者對台灣的認識，以促進他們對台灣的認同感。

#### （五）日本殖民統治做為一種「資產」

為了將台灣人的歷史經驗與集體記憶區別於外省人——或者更廣泛的中國人——的歷史經驗與集體記憶，笠詩社與《臺文》成員開始強調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重要性。譬如在1982年十月，《笠》與《臺文》分別同步推出專輯，探討台灣詩人與小說家如何處理日本殖民統

46譬如《笠》1984,120:144。

治的經驗，尤其是台灣人在戰爭「太平洋戰爭」期間所遭受的苦厄。對笠詩社與《臺文》成員來說，反省殖民時期的歷史經驗，是「台灣文學在尋求本土自主化的基礎」；日本殖民統治與「太平洋戰爭」經驗賦予台灣文學一種獨特的性質與價值，特別是一種「抵抗性格」，而這種傳統特質並非來自「漢民族」的根源。47

笠詩社成員在80年代初對被殖民經驗的這種強調，和他們在70年代中鄉土文學論戰時期刻意淡化殖民統治對他們的影響，構成鮮明的對比。如今被殖民的歷史變成是一項「資產」，而不再是「負債」。對笠詩社與《臺文》成員來說，殖民統治正可以用來合理化他們的宣稱，亦即認為台灣文學已經脫離中國文學的脈流而形成一獨特的傳統。在重估殖民時期台灣作家現代詩「遺產」時，陳芳明雖然沒有否認中國五四運動對殖民時期台灣新文學發展的影響，但他認為台灣作家對殖民統治的控訴已使台灣新文學有其特質，亦即「台灣新文學一開始就奠下入世的傳統」，和現實、鄉土密切結合，因此可「以現實主義一詞來概括台灣新文學傳統的全部」（宋冬陽 1983:14-15）。

在80年代上半葉，《笠》與《臺文》成員致力於將台灣文學「去中國化」，亦即將殖民時期以來的台灣（本省）人的文學發展詮釋成一個與中國（民族）文學進展少有或沒有關連的獨特文學傳統。自從80年代下半葉以來，他們致力於將台灣文學「民族化」（nationalize），亦即將台灣文學賦予一種民族的性格，將它再現為一個獨特的「台灣民族」的文學傳統，而這個傳統所指涉的，比80年代上半葉的台灣文學概念更廣泛，包括日本殖民時期之前的，以及各族群的文學表現。因此這些支持台灣獨立的作家與文學批評者的台灣文學論述更進一步政治化。這種文學意識型態的激進化，是伴隨1986年底之後台灣劇烈的政治變遷而來的。民進黨的成立，政治控制的持續放鬆，台灣獨立運動的快速發展，政治統治菁英的「台灣化」，及台灣與中國大陸互動

47見《笠》1982,111:14-20（「台灣現代詩的殖民地統治與太平洋戰爭經驗（座談）」）；《臺灣文藝》1982,77:4-7,19-117（「台灣小說中的太平洋戰爭經驗專輯」）。

的增長，所有這些匯合在一起促動了將台灣文學民族化的論述的發展。

#### 四、政治自由化，台灣民族主義，與「台灣民族文學」

在90年代上半葉更自由的政治氣氛中，台灣民眾的政治利益認知愈來愈複雜。不過一個事實是這期間認同自己是台灣人的民眾顯著增加，而認同自己是中國人者顯著減少（陳文俊 1996）。同時民進黨的主張也有所調整，比創建初期更重視現實的考慮。為了淡化民進黨受福佬人主控的形象，並且爭取其它族群的支持，大約在1989年前後，民進黨的領導者開始用「四大族群」來指稱台灣不同族群背景的人民。這個分類後來被大眾——包括國民黨與新黨——廣泛接受，逐漸與以往本、外省人的二分法並行，甚至有取而代之的趨勢。伴隨這個新的分類詞彙而來的，是社會上開始普遍提倡族群平等的觀念。新的族群分類的流行代表民眾逐漸認識到四個族群的差異，而這種差異以往在國民黨的中國民族主義意識型態下是被淡化的。另外，支持台灣獨立的人士提倡將台灣視為一個「命運共同體」，這種概念旨在促使民眾相信他們雖然有族群界線的區隔，但在一個政治社群的架構下，仍然緊密相關。命運共同體概念在90年代上葉的出現，目的在促進一種帶有民族主義傾向的新的台灣認同感（Chang 1996）。

John Breuilly曾指出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運用，可以發揮協調（coordination）、動員（mobilization）、與合法性（legitimacy）三種不同的功能，並且不同的民族主義有不同的功能，而即使是同一民族主義，在不同的階段也可能企圖發揮不同的功能（Breuilly [1994]1996:166-167）。我們可以說，80年代初黨外提倡的台灣民族主義主要的作用在動員福佬族群的政治支持。到了80年末、90年代初，雖然台灣民族主義者動員民眾支持的需要始終存在，但其意識形態在結合「四大族群」與「命運共同體」的論述後，逐漸突顯其協調與合法性的功能——亦即協調台灣不同族群，並對外——尤其對中共宣稱台灣

做為一個獨立自主的政治社群的合法性。換句話說，台灣民族內涵（從福佬族群為主的本省人到四大族群）與屬性（較排外的福佬中心主義到較開放的多元文化主義傾向）的轉變，意味著其所企圖發揮的功能的轉變。這種變化，充分顯示民族認同的社會建構的性質，也顯示民族做為一種集體認同，往往是民族主義運動引發的結果，而非其原因（Gellner 1983:55；Hobsbawm 1990:10）。台灣文化民族主義中的台灣（民族）文學論述在80年代下半葉後的變化，正反映了上述的轉變。

自從1986年民進黨成立後，笠詩社與《臺文》成員更進一步涉身反對政治，成為台灣民族主義政治/文化發展的一個重要部分。民進黨成立後不久，這兩個團體的主要成員，譬如巫永福、葉石濤、李喬、楊青矗、李敏勇、趙天儀等，倡議進一步將具有鮮明的台灣意識的文化菁英組織起來。1987年二月「台灣筆會」成立，以楊青矗為首屆會長，約有130位會員，包括詩人、小說家、散文家、文學批評家、畫家、音樂家等。笠詩社與《臺文》成員則為主要會員

與領導幹部，而《臺文》也成為這個新團體的機關刊物。台灣筆會的成立宣言認為「文化運動是一切改革的根源」，因此要求「全面的文化改革」，以改善社會。宣言同時呼籲作家「全面的覺醒」，投入社會改革，以建立一個「精神的政府」。<sup>48</sup>在80年代末，台灣筆會發佈一系列公開聲明，抗議國民黨政府不准海外台獨黑名單人士返台、逮捕政治異議人士、壓制群眾運動、逃避二二八事件中屠殺本省人的責任等等。在這期間，楊青矗曾擔任民進黨的《民進報》周刊的總編輯，而笠詩社與《臺文》成員如李敏勇、陳芳明也成為其重要的撰稿人。

台獨運動快速推進的80年代下半葉，我們也看到台灣文化民族主義的文化論述蓬勃發展。在這個發展中扮演主要角色的，正是笠詩社與《臺文》的作家與文學批評家。整體來說，這一波文化論述的最大特色是企圖將台灣文化「去中國化」之後再「民族化」。<sup>49</sup>《台灣新文

<sup>48</sup>見《文學界》1987,21:4-6。

<sup>49</sup>這一波文化論述特色的詳細討論，參見筆者博士論文（Hsiau 1998）第四章。

化》（1986年九月-1988年五月）與《新文化》（1989年二月-1990年12月）這兩本新雜誌的創刊發行，代表了這一波高度政治化的文化論述風潮。這兩份期刊的名稱，明白顯示其創辦者提倡一種新的文化認同的企圖，而其社長或發行人都是民進黨的重要領導者謝長廷。笠詩社與《臺文》的主要成員，譬如趙天儀、李喬、楊青矗、宋澤萊、高天生、李敏勇等，則為其顧問、社務或編輯委員。在這時期，這兩份新刊物與《臺文》成為台灣文化民族主義者傳播其文化論述的主要管道。

### （一）書寫台灣人的台灣文學史

文學論述是台灣民族主義文化論述的一個主要部分。在80年代下半葉以來的這種文化論述發展中扮演主要角色的笠詩社與《臺文》作家與文學批評者致力的，主要就是文學的議題。在80年代下半葉，對這些作家與文學批評者而言，一個極其迫切的議題是台灣文學史的撰寫。雖然鄉土文學論戰之後，笠詩社與《臺文》成員經常援引日本殖民時期以來的現代台灣文學成就，用來正當化他們的本土或台灣傾向，然而到80年代末為止，卻只有兩篇分別由黃得時（[1954, 1955]1979）、陳少廷（1977）所寫的現代台灣文學的簡短歷史介紹。

<sup>50</sup>

相對地，在1987年前後，三部範圍涵蓋戰前與戰後時期的長篇台灣現代文學史著作，已由中國大陸學者撰寫成書並出版，成為80年代後中國大陸快速發展的「台灣研究」成績的一部分。<sup>51</sup>一般而言，中國大陸學者的台灣文學研究充滿中共關於中國統一的政治宣傳，並且刻意突出台灣文學作品中表露的「中國意識」。這些研究經常強調中國五四運動對日本殖民時期台灣現代文學發展的重大影響，宣稱整個台灣文學不過是「中國民族文學」的一部分。<sup>52</sup>

50 陳少廷的書大體上根據黃得時的長篇文章而撰寫。

51 關於最近15年左右中國大陸研究台灣文學的發展情形，見劉登翰（1990）；古繼堂（1992）；宋如珊（1993）。從1986到1991年，中國大陸已出版八部範圍涵蓋戰前與戰後時期的長篇台灣現代文學史著作。見宋如珊（1993:104）。

52 譬如劉登翰（1995）。

在這種情況下，笠詩社與《臺文》成員開始擔心對台灣文學史的「解釋權」將被中國大陸學者獨占。自80年代初以來，他們經常呼籲撰寫「台灣人的台灣文學史」。53到1987年，葉石濤的《台灣文學史綱》（以下簡稱《史綱》）終於出版。54自80年代初以來，葉石濤已逐漸成為「自主的台灣文學」論述的主要建構者之一（余昭理 1991），他的《史綱》則代表支持台灣獨立的文化菁英的典型的文學論述。這本書首先簡略勾勒明鄭時期到日本殖民初期中國古典文學在台灣的傳播與發展，接下的一章則敘述日本殖民時期台灣現代文學的出現與推進。《史綱》其餘的五章則討論戰後台灣現代文學的發展。雖然該書並未完全抹煞外省籍作家及其作品，但葉石濤做為資深的鄉土文學與台灣意識的熱心提倡者，顯然偏好本省作家，而以較大的篇幅加以討論。55在《史綱》的前序中，他明白地指出撰寫該書的「目的在於闡明台灣文學在歷史的流動中如何地發展了它強烈的自主意願，且鑄造了它獨異的台灣性格」（葉石濤 1987:ii）。雖然葉石濤承認日本殖民時期台灣現代文學的出現是受中國五四時期白話文運動的影響，但他認為當時台灣作家已「逐漸產生和建立自主性文學的意念」。他認為，因為日本統治而使台灣與中國大陸持續分隔，因此這種發展方向是必須的、「正確而不可避免的途徑」（葉石濤 1987:28）。

抱持這種多少有點決定論意味的態度，葉石濤在《史綱》中修訂了他過去對台灣文學的一些看法。事實上，直到鄉土文學論戰時期，葉石濤仍認為鄉土文學當然是中國文學的一部分，而文學表現應追求台灣地域認同與中國民族認同的平衡。對他而言，這兩種認同並非無法並存（Hsiao 1998:161-164）。1984年，亦即《史綱》出版三年前，他在一篇討論60年代台灣文學的文章中曾推崇《臺文》與《笠》兩種

53 譬如呂昱（1983）；高天生（1983）；林衡哲（1986）；陳芳明與彭瑞金（1987）；陳少廷（1987）；陳嘉農（1988）。

54 80年代中，《文學界》成員警覺到中國大陸學者對台灣文學史的積極研究，因而集體商議決定撰寫台灣文學史。原來決定由葉石濤等人分別負責一部分，但後來由於史料收集不易等因素，葉石濤因此先行撰寫《史綱》。見《文學界》1988,28:70-71。

55 比較余昭理對葉石濤的台灣文學觀點的批評。見余昭理（1991）。

刊物具有「台灣新文學運動一脈相承的傳統精神」，亦即「對時代社會的強烈的批判精神」。但是他也批評這兩份刊物的作家「過份注重本土現實及社會性觀點」，因此使他們「失去由整個中國或世界的立場來分析鄉土問題的巨視性看法以及歐美文學嶄新思想的吸收和容納」（葉石濤 1984:143）。不過在基於這篇1984年文章的《史綱》的段落中，雖然我們也見到幾乎相同的批評用語，但「整個中國」一詞已被刪除（葉石濤 1987:118）。

在這篇1984年的文章中，葉石濤也指出年輕的本省籍鄉土小說家，包括陳映真、黃春明、王拓、楊青矗等人，跟老一輩的本省作家，譬如吳濁流，已少有接觸，因此他們的作品已非「老調的鄉土文學」。葉石濤繼續說：「這可能是新一代的這些作家不太認同台灣本土意識較強的老一輩鄉土文學，而是較能從整個中國的命運來思考台灣文學的前途的關係。這也許是一種進步吧。」（葉石濤 1984:146）然而在源自1984年這篇文章的《史綱》的段落，上面引文中對年輕一代鄉土小說家正面讚賞的肯定語氣，已被修改成較中性用詞，而「這也許是一種進步吧」一句，則被略去（葉石濤 1987:123）。

修改自己過去對台灣文學的看法，以符合自己目前的台灣民族主義主張與當前民族主義政治發展的，並非只有葉石濤一人。80年代下半葉，在支持台灣獨立的作家與文學批評者之間，這並非不尋常的事。譬如本身也是笠詩社一員的陳明台（1948-），在1982年討論笠詩社詩人在作品中表現的鄉愁時指出，笠詩社中較年輕的「第二世代」詩人——如白萩、趙天儀、林宗源、李魁賢等人的歷史體驗，「是由台灣光復，無寧說是一個全然新的歷史的『生』而開始」；而他們的文學生涯的出發「是從成為祖國的、中國的，和原本即是做為故鄉而存在的台灣的交接點而邁步……」（陳明台 1982:19）。到1989年這篇評論收入《笠》文章結集出版的《台灣精神的崛起》，作者已將上面引文中的「台灣光復」、「全然新的歷史的『生』」字眼，代之以「國民政府的接收、支配台灣」這種較負面的用詞，而原本在「中國的」之前出現的「祖國的」一詞也被略去（陳明台 1989:32）。

在這段期間，葉石濤《史綱》出現之前唯一出版成書的日本殖民時期台灣現代文學史的作者陳少廷，也為其1977年的這本書中「著力於闡述中國文學對台灣新文學之影響」而表達歉意。面對一些台灣民族主義者對他早期著作的嚴厲抨擊，陳少廷承認「台灣新文學有其獨特性及其存在之社會文化背景，因此，把台灣新文學視為中國文學之支流，乃是不當之論。……日據時代的台灣新文學是台灣文學，不是中國文學」（陳少廷 1987; 1988）。<sup>56</sup>

## （二）建國的文學

90年代以來，我們可以在台灣文化民族主義者的論述中看到他們努力將台灣文學「民族化」的企圖。這時期政治自由化的加速顯然促進這種發展，特別是1991年憲法臨時條款的廢除與1992年刑法的修正，更促成前所未有的言論自由。公開提倡台灣獨立建國之類激進的主張已不再是非法行為。針對這種新情勢，已停刊的《文學界》的三位創辦人鄭炯明、曾貴海、與陳坤崙再度在高雄

創辦一份新的刊物《文學台灣》。笠詩社與《臺文》重要成員，包括葉石濤、陳千武、鍾肇政、李喬、李敏勇、陳芳明、彭瑞金等人，擔任其顧問或編輯委員。90年代初以來，《文學台灣》與《笠》、《臺文》於是成為台灣文化民族主義者提倡台灣（民族）文學概念的主要園地。

笠詩社與《臺文》成員將台灣文學「民族化」的努力主要可分兩方面。第一，台灣現代文學的發展被重新詮釋成一個追求獨特的台灣民族/國家認同的歷史過程，而民族/國家認同被視為日本殖民統治下的1920年代以來的整個台灣現代文學的基本主題。他們強調，台灣文學的發展自始就朝著「建構台灣民族」的方向在發展，尤其是1930年代日本殖民統治下台灣文化菁英提倡以「台灣話」（主要是福佬話）寫

56關於台灣文化民族主義者對陳少廷該書的批評，見陳芳明與彭瑞金（1987）；許水綠（1988）。在《台灣新文學運動簡史》中，陳少廷認為「台灣的文學本就是源自中國的文學」，因此1945年「台灣重歸祖國，自然就再沒有所謂『台灣文學』可言了……。」見陳少廷（1977:165）。

作「鄉土文學」，被視為最早追求台灣文學獨特性、自主性、與主體性的努力。57在這種論述中，日本殖民時期鄉土文學與「台灣話文」（台灣話的書寫系統）的提倡者的漢/中國文化認同自然被有意或無意地淡化。58另外二二八事件結束後，在當時《台灣新生報》文學副刊上曾有一系列本、外省文化菁英間對台灣文學前途的熱烈討論。這次持續了20個月（1947年八月-1949年四月）的論辯中本省文化菁英對台灣文學獨特性的強調，被台灣文化民族主義者視為日本殖民時期台灣文化菁英關懷台灣文學與文化的「主體性」自然的延續。雖然許多參與那次論辯的本省文化菁英的最終目標是希望地域性的文學表現能被接受為中國文學的一部分。59

再者，1964年《臺文》與《笠》的出現開始被視為二二八事件後台灣意識的復興。笠詩社與《臺文》成員如今形容兩份刊物的創辦為有意識的反國民黨的舉動，而它們持續提倡台灣意識，最終甚至促成70年代鄉土文學與黨外政治反對運動的發展。60至於70年代中的鄉土文學論戰，則被定位為台灣民族認同與中國民族認同互相衝突的結果。61對支持台灣民族主義的作家與文學評論者來說，從1920到1990年代，所有的台灣（本省）作家都因為關懷台灣人做為一個獨特民族的命運而緊密相連；台灣文化與文學主體性的建立，是不同世代的台灣（本省）作家奮鬥的目標。對這些台灣文化民族主義者而言，就像一個民族試圖建立其獨立的政治主權一樣，台灣作家始終在尋求建立「文學主權」，而台灣文學必須擁有自己的國籍。62

57 譬如彭瑞金（1992）；陳芳明（1992）；鄭炯明等（1994:96-102）。

58 參見筆者博士論文（Hsiau 1998）第二章對1930年代初鄉土文學與台灣話文提倡的分析。

59 見鄭炯明等（1994:103）。關於1947到1949年這一系列的文學討論，參見筆者博士論文（Hsiau 1998）第三章的分析。

60 這種說法，譬如白萩（1989:5-6）；李敏勇（1991:3）；彭瑞金（1993:69）。

61 譬如陳芳明（1992）。

62 譬如彭瑞金（1989, 1992）；鄭炯明等（1994）。

### （三）台灣民族文學：四大族群，合而為一

將台灣文學「民族化」的第二個面向，是將台灣文學的起源「多元化」。80年代初笠詩社與《臺文》成員開始使用的「本土文學」或「台灣文學」主要指的是日本殖民時期以來台灣（本省）人創作的現代文學——特別是小說與詩。80年代末當「四大族群」與「命運共同體」概念開始流行，台灣文化民族主義者的文學論述也開始強調台灣文學的多族群性格。台灣文學的起源被視為至少包括：• 原住民文學（傳統神話、傳說、歌謠與最近原住民的文學作品等）；• 漢人民間文學（福佬與客家民間故事、謠諺、戲劇等）；• 漢人古典文學（明、清以來傳統詩、文等）；• 日本殖民時期新文學（台灣人、在台日本人作品等）；• 戰後文學（本、外省人各類文學作品）。63 所有這些都被視為台灣民族文學的組成部分，而其中原住民文學與漢人民間文學又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對台灣文化民族主義者而言，神話、傳說、歌謠之類的原住民文學的存在，顯示台灣文學的傳統可以往前推溯幾千年，是一源自原住民文學的獨特民族文學傳統。原住民文學，加上具有強烈地方色彩的漢人民間文學，因此被用來合理化「台灣文學不應該被歸類為中國文學」的說法。64 對他們來說，從日本殖民時期開始，台灣文學就是台灣新文化與民族解放運動的先鋒，雖然台灣人獨立建國的目標尚未達成，但80年代以來的台灣文學已先行獨立，而「獨立的台灣國不可沒有獨立的台灣文學」。就台灣文學與中國文學的關係來說，彭瑞金在1995年的一篇文章中，倣效美國19世紀思想家愛默生（Ralph W. Emerson）——他呼籲當時美國知識階層應該結束對歐洲文化傳統長久的依賴——認為90年代「是宣告台灣文學獨立的時候了」。65

63 譬如呂興昌（1993）。葉石濤甚至認為應該納入「平埔九族」，認為「台灣目前的種族應為五個種族」，而「台灣文學應該由這五個種族共同創造，共同建構。」見葉石濤（1994:11）。

64 譬如許水綠（1987:53）；呂興昌（1992）；葉石濤（1992, 1994）；吳錦發（1992）。

65 見彭瑞金（1992, 1994, 1995）。關於愛默生在1837年演說中的呼籲，見Emerson（[1837]1929:25, 35-36）。

總而言之，直到鄉土文學論戰時期，我們很難說《臺文》的作者群有什麼特殊的文學信念，而笠詩社成員則不僅致力於寫作「現代詩」，更追求「中國現代詩」，不僅努力要成為「現代詩人」，更希望成為「中國現代詩人」。然而在美麗島事件之後的幾年之間，這兩個文學團體的許多成員開始從台灣人受外來統治者壓迫並反抗這種壓迫的歷史角度來理解台灣現代文學的發展。台灣文學逐漸被再現為深具反抗外來統治者的精神的一個文學傳統。因此自80年代初開始，以台灣文學「本土化」的概念為中心，一種「去中國化」的台灣文學論述逐漸發展。伴隨80年代下半葉急遽的政治變遷，這種文學論述更進一步激進化，一種具有多元族群文化成分的「台灣民族文學」歷史於是在論述上被建構出來。台灣現代文學史被詮釋成一部台灣（本省）作家藉著作品追尋獨特的台灣民族認同的歷史：所有現代台灣（本省）作家都關懷台灣（本省）人做為一獨特民族的命運，而民族/國家認同是日本殖民時期的20年代以來整個台灣現代文學的主題。

對不少支持台灣民族主義的作家與文學評論者來說，只有當作家以目前官定國語之外的台灣語言——尤其是福佬話——寫作時，台灣民族文學才真正有自己的表達工具。就台灣民族主義文學論述發展的歷史來看，這是從「寫什麼」（寫台灣人的苦難、希望、與追求）、「為誰而寫」（認同台灣人，為台灣人而寫）、與「為何而寫」（為建立台灣文化、文學的「主體性」，為建立一清楚、獨特的民族/國家認同而寫），進一步反省到「用什麼寫」（用台灣語言寫）。在最近十年左右所出現努力要復興台灣語言的人士中，以台灣語言寫作正是他們重要的理念與嘗試之一。這讓我們想到台灣文化菁英在30年代初日本殖民統治下提倡以「台灣話」寫作鄉土文學的經過。語言原本就是民族主義的重要議題，不過本文限於篇幅，不擬再討論當代台灣文化民族主義中的語言與文學的關係。<sup>66</sup>

<sup>66</sup>關於當代台灣文化民族主義中的台灣語言（尤其是福佬話）復興運動、福佬話書寫系統的提倡與設計、寫作的語言工具與台灣民族文學概念的討論，參見筆者的博士論文（Hsiao 1998）第五章。

## 五、結論

本文研究台灣文化民族主義，特別是在文學領域受政治激發的台灣民族/國家認同建構。前面的分析顯示一群主張台灣獨立的作家與文學批評者如何宣稱一個獨特的文學傳統，而在論述中建構一個民族（的概念）。本文指出，一直到80年代初，政治上具有重要性的台灣文化民族主義才因為黨外意識形態動員的影響而出現。在一方面，具有反國民黨傾向的作家與文學批評者——同時也包括福佬台語語言運動者、業餘或專業的歷史學者、民俗學者<sup>67</sup>——等人文知識分子開始主張台灣民族主義，要比政治反對運動者的民族主義動員稍晚，這種過程顯示台灣民族主義運動在世界民族主義發展史上的「晚進者」的性質。另一方面，台灣文化民族主義高度的政治化性質，明顯影響學者對其發展的了解。本文最後針對這兩方面，再加釐清。

## (一) 台灣民族主義做為歷史的「晚進者」與人文知識分子的角色

19世紀歐洲與20世紀被殖民地地區的民族主義運動與建國過程，造就了一個民族國家的世界體系。一個人隸屬於一個民族國家，而且以公民身分來定義自己，已經變得非常自然，以致於一個人沒有國家的情形，是我們很難想像的。任何一群人民若能清楚建構、宣稱自己的民族認同以及被一既存國家統治的壓迫感，則往往被認為有權依民族自決的原則，在一領土上獲得政治的獨立。不過在20世紀末的今日，不少學者已經開始認為民族主義不再像以往一樣，是歷史發展的主要動力。他們認為全球不斷整合——特別是在經濟領域——的結果，在許多方面都削弱了民族國家的控制能力，隨之而來的是民族主義意識

67參見筆者博士論文（Hsiao 1998）第五、六章的分析討論。

形態的日漸衰頹。 68

然而台灣民族主義意識形態與運動在20世紀末才開始在台灣有重大發展，成為台灣政治發展顯著的變數。雖然政治反對運動從70年代初就日益發展，但一直到80年代初，黨外才對國民黨的統治進行民族主義的挑戰。70年代以來，台灣在國際上逐漸喪失代表全中國的正當性，愈難以「中華民國」之名爭取國際活動空間，邦交國撤銷承認而斷交之事時有所聞，這些都使許多民眾產生可能變成「沒有國家」或被中共統治的焦慮。69另一方面，戰後本省人處於不利的政治地位，伴隨而來的是其語言、歷史記憶、文化傳統等在公共領域受到壓抑。80年代初，黨外激進成員開始訴諸民眾對「沒有國家」或被中共統治的焦慮，以及本省人的被壓迫感，將這些感受轉化成條理一貫的民族主義意識型態。這個意識型態的重點在提倡一新國家取代在國內具壓迫性、在國際上逐漸不被承認的中華民國，亦即企圖建立一個主要能對多數族群的本省人負責，又能在當代的民族國家世界體系中獲得應有地位的國家。在這個民族國家的統治形式被視之為當然，而公民身分與民族自決的概念也被廣泛接受的時代，黨外利用民族主義這個方便的意識型態爭取群眾支持，而這證明是有一定程度效用的。

在19世紀到20世紀初，民族國家正開始成為主要政治統治架構，民族也開始成為流行的集體認同類型，用來正當化那些獲取或運用統治權力的行動。俄羅斯帝國下的猶太人、哈布斯堡帝國下的斯洛伐克人、奧圖曼帝國下的希臘人、大英帝國下的愛爾蘭人，以及Hroch所研究的其他中、東歐被宰制族群的文化菁英藉著創造集體象徵、重新挖掘與改寫歷史、復興語言與民俗等——亦即藉著塑造一種民族特殊

68持這種觀點的重要學者之一是Eric Hobsbawm，見Hobsbawm（1990: Chapter 6）。不過也有反對的看法，參見McGrew（1992:87-94）。Nira Yuval-Davis則指出全球化與國際移民的趨勢未必削弱民族主義意識形態與運動，反而可能加強它們。見Yuval-Davis（1997:64-66）。

69許多民眾到海外旅遊之後更強化這種焦慮。1979年國民黨政府開放海外自由旅遊後，許多民眾共有的經驗就是許多國家不承認他們的中華民國護照而感到不愉快或屈辱。

構民族認同感的文化活動與結果，為後來的民族主義政治動員鋪下基礎。在一方面，許多這一類的文化菁英成為後來民族主義政治運動初期的領導者。另一方面，他們的文化活動與結果形塑了群眾的民族認同感，為政治動員創造有利的條件。然而一旦民族這種新的集體認同模式確立了，它就到處傳播、被抄襲，可以被世界各地有意識地借用來正當化那些追求或運用國家權力的政治行動，成為政治動員的意識型態，而不須像在20世紀初之前，依賴許多長期的文化政治變遷與文化菁英對族群歷史文化的再發現來慢慢形塑。

和前述那些歐洲的例子不同，台灣反國民黨的人文知識分子的文化活動與結果並沒有扮演催生政治民族主義的角色。80年代初出現黨外台灣民族主義運動之前，並無任何重要的歷史文化潮流或運動，足以有激發台灣民族主義政治行動的顯著效果。促使黨外以激進的民族主義方式挑戰國民黨統治及其主要的正當化意識型態——中國民族主義——的主要因素，是1979年的美麗島事件及後來對黨外人士的政治迫害。美麗島事件、政治迫害、黨外激進成員大膽的民族主義宣傳綜合的影響，又激起反國民黨傾向的本省籍作家與文學批評者（也包括歷史學者與語言復興運動者等）的民族主義情感。80年代末以來，不少台灣文化民族主義者宣稱《臺文》與《笠》兩份文學刊物的創辦，是復甦的台灣意識所激發的有意識反國民黨的行動，而且甚至促成70年代的黨外反對運動。然而實際的歷史過程並非如此。換句話說，台灣民族主義運動的發展序列，並不符合Hroch提出的三階段論。

本文的分析，並非否認80年代初之前，本文所討論的本省籍作家與文學批評者沒有對於本鄉本土的熱愛與關懷。相反地，他們以較為樸實明朗的筆調在詩與小說中呈現他們所熟悉的台灣生活、文化、與歷史，或者討論本省籍作家的作品，時常可以使讀者感受到他們對台灣鄉土的深刻情感。這種文學的題材與流露的情意，與外省籍的作家與作品比較起來，尤其明顯。這種對本鄉本土的情感，以及在文學上加以表現的興趣，一直是文學創作的重要動力之一，因此在世界其他地區的作家身上也極容易發現。然而這種情感未必具有政治的意味，更未必具有民族主義的意涵。從這種對本鄉本土的情感到民族主義的認同與主張，不應該視為自然的、或者必然的連續發展。在台灣文化民族主義的例子中，這種發展毋寧是歷史偶然造成的轉折與結果。就本文的分析而言，促成台灣文化民族主義發展最主要的歷史偶然因素，是美麗島事件的發生。

對台灣政治社會變遷具有重大意義的「台灣民族」概念的建構，只發生在美麗島事件之後。事實上，這個概念並不是新的。在日本殖民時期，台灣共產黨就在其〈政治大綱〉中宣傳「台灣民族的發展」（台灣總督府警務局 [1939] 1989:24-26）。然而在台共之外，這個集體認同概念並沒有被廣泛接受。再者，戰後著名的海外台獨人士史明自60年代初即開始發展其「台灣民族形成」的理論。<sup>70</sup>然而就像戰後海外台獨運動一樣，史明的概念與理論在80年代之前，對台灣的政治反對運動少有影響。現代的民族國家理念包括三個不同但互相重疊的要素：「民族」做為集體認同；「國家」做為民族在政治上獨立的表現；以及「領土」做為一個地理區域，顯示民族界線與國家疆界符合一致的必要（Woolf 1996:1-2）。就這三個要素來說，黨外領導者在80年代初的意識形態動員，主要在提倡以一個相當於台灣島嶼領土範圍的新國家，取代依照中國民族主義與大陸疆域所組織的中華民國。至於建構台灣民族認同感的工作，主要留待支持台灣民族主義的人文知識分子。這些文化菁英藉創造台灣人集體象徵、重新詮釋台灣文學（以及復興福佬台語、改寫台灣歷史）等，以支持政治上的認同主張與行動。

## （二）台灣文化民族主義：土壤中等待萌芽的種子？

反國民黨的人文知識分子的台灣文化民族主義因黨外意識形態動員而發展的事實，清楚地顯示在最近十五年左右台灣文化與民族認同政治化的過程。笠詩社與《臺文》成員因為美麗島事件而激發政治意識，認識到國民黨統治的專制性質，因而逐漸支持黨外所提倡的民族主義信條。這些意識形態明顯地改變這些成員對他們文學生涯，以及對台灣文學的看法。

<sup>70</sup>史明的《台灣人四百年史》日文版在1962年出版，中文版在1980年於美國出版，並在國民黨的查禁政策下，在台灣具有反對政治意識的讀者之間流傳。中文增補版則在1998年於台北正式公開出版。

台灣民族主義者文化與民族認同明顯的政治化性質，已經影響到學者對台灣文化民族主義發展的了解。譬如一些研究者雖然指出，美麗島事件對本省作家與文學批評者的台灣民族主義發展至關重要，但他們相信這種發展的種子早已播下。譬如這些研究者認為，葉石濤與陳映真在鄉土文學論戰時期分別以「台灣（鄉土）文學」與「在台灣的中國文學」的不同概念，提出對台灣（本省）人文學表現性質與前途的不同看法，實際上代表鄉土文學作家與支持者陣營中「統派」與「獨派」的內部分裂。這些研究者認為兩派因為了解到國民黨嚴密的政治控制下，他們必須小心行事，並且彼此合作以應付國民黨，因此刻意避免了公開衝突；直到美麗島事件後，他們表面上的和諧才無法維持而公開決裂。<sup>71</sup>這種論點主要的問題是把政治化的族群性看成有如在土壤中等待發芽茁壯的種子，或者看成好像如Daniel Bates所說的「瓶中之魔」（a genie in the bottle），一旦嚴格的政治控制放鬆了就突然竄出（Bates 1994:219）。然而一般而言，族群認同與民族認同是逐步浮現成形的，而且必須放在特定的社會政治脈絡中加以理解。訴諸部落、族群團體、或民族社群，只有在特定的環境中方有其效果。因為抱持「土壤中等待萌芽的種子」這種觀

點的學者認為台獨傾向早已 至少從鄉土文學論戰時期開始 存在那些後來成為台灣民族主義者的心中，因此他們錯誤地假設有一個以葉石濤為代表的「獨派」存在於鄉土文學主要作家與支持者陣營中。事實上，這種團體只有在美麗島事件之後才形成。

葉石濤1987年出版的《台灣文學史綱》雖然成為台灣文化民族主義者典型的文學論述，但直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葉石濤仍鼓勵本省作家追求台灣地方意識與中國民族意識在文學表現中的平衡，並不認為兩者必然不能相容。笠詩社與《臺文》成員在80年代之前，仍懷抱一定的中國民族情感，他們民族/國家認同的轉折，是美麗島事件之後政治社會變遷激發的結果。換句話說，政治化的族群性並非一種始終潛在的力量，等待在任何可能的時候發揮作用。反之，如本文前面分析所顯示的，它實為特殊的社會政治變遷的結果。

71 這種對文學領域中台灣民族主義發展的看法，譬如呂正惠（1992:58-59; 1995:78-79）。

誌謝：本文為作者博士論文（Hsiau 1998）部分章節改寫增補而成，初稿曾發表於「跨世紀的台灣社會與社會學學術研討會」（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台灣社會學社主辦，1999年1月17日）。作者感謝吳乃德先生的評論及與會諸君的批評。從博士論文到本文的寫作期間，幾位師友曾經善意地提醒這樣的研究置身於台灣現實的族群與民族主義政治環境中，所可能面臨的處境。作者在公開場合發表研究心得，聽眾也曾質詢這樣的研究與作者的現實政治立場的關係。這段期間，作者對研究自己所屬社會的族群與民族主義政治者可能面對的尷尬處境，逐漸了然於心。做為學術研究，本文的目的不在臧否特定的現實政治行動的價值，也不在發抒作者對特定的現實政治立場的好惡。如果在文中流露出作者的某種「潛意識」，那是作者在學術研究者身份之外，無可避免的情意，相信通達之士可以理解，而不會費心揣測。希望本文被認為對理解我們社會特殊的現象，有一點點啟人清明的作用，而不會被當成是攻訐某些人的武器。也希望我們的社會有越來越多的人，對這樣的研究不加厚誣 也不加謬賞，而逐漸用平實簡單的眼光看它，使往後研究類似課題者，不用再添加如同上述的累贅告白。

## 參考書目

王甫昌

1996 反對運動的共識動員:一九七九・一九八九年兩波挑戰高峰的比較, 台灣政治學刊1:129-210。

王曉波

(1987) 1988 台灣最後的河洛人 巫著《風雨中的寧靜》讀後感, 收入其台灣史與台灣人, 頁239-254。台北: 東大。

白萩

1989 百年熬煉, 收入鄭炯明編, 台灣精神的崛起 「笠」詩論選集, 頁 4-7。高雄: 文學界。

古繼堂

1989 台灣新詩發展史，台北：文史哲。

1992 台灣文學研究十年，文訊79:26-29。

史明

1980 台灣人四百年史，聖荷西，美國加州：蓬島文化公司。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

(1939) 1989 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編，領台以後的治安狀況，中卷，台灣社會運動史，第三冊，王乃信等譯。台北：創造。

羊文漪

1995 他者的超越 台灣當代藝術的轉折與再造，藝術家238:215-226。

吉也

1988 意義辯證與社會重建 李敏勇訪問記，文學界28:96-105。

宋如珊

1993 大陸的台灣文學研究概況，中國大陸研究36(2):94-107。

宋冬陽(陳芳明)

1983 日據時期台灣新詩遺產的重估，臺灣文藝83:9-27。

1984a 現階段台灣文學本土化的問題，臺灣文藝86:10-40。

1984b 朝向許願中的黎明：試論吳濁流作品中的「中國經驗」，文學界10:127-46。

巫永福

1978 悼張文環兄回首前塵，笠84:14-22。

李喬

1983 台灣文學正解，臺灣文藝83:6-7。

1984 從文學作品看台灣人的形象，臺灣文藝91:57-66。

李喬，趙天儀

1988 文學，文化，時代：詩人和小說家的對談，臺灣文藝110:28-50。

李敏勇

1991 檢視戰後文學的歷程與軌跡，現代學術研究4:1-11。

李魁賢

(1982) 1987 論巫永福的詩，收入其台灣詩人作品論，頁9-25。

台北：名流。

杜國清

1985 「笠」與台灣詩人，笠128:54-65。

呂正惠

1992 戰後台灣文學經驗，台北：新地。

1995 文學經典與文化認同，台北：九歌。

呂昱

1983 打開歷史的那扇門：為催生「台灣文學史」敲邊鼓，文學界5:206-209。

呂興昌

1992 走向多音交響的語言共同體 從台灣文學的翻譯談起，文學台灣3:5-8。

- 1993 台灣文學資料的蒐集整理與翻譯，文學台灣，8:21-35。
- 余昭理
- 1991 瞭解與再思 評葉石濤對台灣文學的評論，新地文學(6):6-23。
- 林衡哲
- 1986 漫談我對台灣文化與台灣文學的看法，臺灣文藝100:49-56。
- 吳錦發
- 1992 為「原住民文學專輯」說幾句話，文學台灣4:9-10。
- 吳濁流
- 1964a 漢詩須要革新，臺灣文藝1:63-68。
- 1964b 漫談台灣文藝的使命，臺灣文藝4:74。
- 1971 再論中國的詩，臺灣文藝30:4-14。
- 施敏輝（陳芳明）
- （1984）1988 注視島內一場「台灣意識」的論戰，收入施敏輝編，台灣意識論戰選集，頁1-18，台北：前衛。
- （1985）1988 「台灣意識論戰選集」序，收入施敏輝編，台灣意識論戰選集，頁1-7，台北：前衛。
- 紀弦
- 1966 給趙天儀先生的一封信，笠14:2-9。
- 高天生
- 1981 歷史悲運的頑抗 隨想台灣文學的前途及展望，臺灣文藝72:291-301。
- 1983 論台灣文學史的寫作架構，臺灣文藝84:18-23。
- 1985（1994） 台灣小說與小說家，台北：前衛。
- 許水綠
- 1987 筆尖指向現實 台灣文學作品與社會生命，台灣新文化13:52-59。
- 1988 不要容忍陳少廷：再評「台灣新文學運動簡史」，台灣新文化17:82-86。
- 郭成義紀錄
- 1982 近三十年來的台灣詩文學運動暨「笠」的位置 座談會紀實，文學界4:168-188。
- 陳千武
- 1975 詩的行為，笠68:1。
- 1989 豎立台灣詩文學的旗幟，收入鄭炯明編，台灣精神的崛起「笠」詩論選集，頁1-3。高雄：文學界。
- 陳文俊
- 1996 國家認同與總統大選：分裂國家民主化問題的探討，發表於「選舉制度、選舉行為與台灣地區政治民主化」學術研討會，台北，11月30日，12月1日。
- 陳少廷
- 1977 台灣新文學運動簡史，台北：聯經。
- 1987 對日據時期台灣新文學史的幾點看法，文學界24:47-51。

1988 不堪回首話當年：我為什麼要編撰「台灣新文學運動簡史」，台灣新文化18:58-61。

陳芳明

1992 家國半世紀 台灣的政治與文學，文學台灣2:73-82。

陳芳明，彭瑞金

1987 陳芳明、彭瑞金對談：釐清台灣文學的一些烏雲暗日，文學界24:17-46。

陳明台

1969 笠詩社五年大事記，笠30:21-27。

1982 根源的掌握與確認 台灣現代詩人的鄉愁（II），笠112:19-23。

1989 鄉愁論 台灣現代詩人的故鄉憧憬與歷史意識，收入鄭炯明編，台灣精神的崛起 「笠」詩論選集，頁20-67。高雄：文學界。

陳嘉農（陳芳明）

1988 是撰寫台灣文學史的時候了，文學界25:6-14。

陳樹鴻

（1983）1988 台灣意識 黨外民主運動的基石，收入施敏輝編，台灣意識論戰選集，頁191-205。台北：前衛。

彭瑞金

1982 台灣文學應以本土化為首要課題，文學界2:1-3。

1983 追尋，迷惘與再生 戰後的吳濁流到鍾肇政，臺灣文藝83:42-48。

1989 寫有國籍的台灣文學，臺灣文藝119:4-5。

1992 當前台灣文學的本土化與多元化 兼論有關台灣文學的一些異說，文學台灣4:11-36。

1993 台灣民族運動與台灣民族文學，收入國家認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57-78。台北：現代學術研究基金會。

1994 台灣文學定位的過去和未來，文學台灣9:93-116。

1995 是宣告台灣文學獨立的時候了，文學台灣15:333-336。

黃海鳴

1995 本土意識、文化認同及台灣當代藝術之脈動，藝術家238:227-234。

黃得時

（1954，1955）1979 台灣新文學運動概觀，收入李南衡編，日據下台灣新文學，明集5：文獻資料選集，頁269-324。台北：明潭。

葉石濤

1965 台灣的鄉土文學，文星97:70-73。

1968 兩年來的省籍作家及其小說，臺灣文藝19:37-45。

（1977）1978 台灣鄉土文學史導論，收入尉天驄編，鄉土文學討論集，頁69-92，台北：遠流。

1984 六十年代的台灣鄉土文學，文訊13:137-46。

1987 台灣文學史綱，高雄：文學界。

- 1992 台灣文學本土化是必然途徑，文學台灣4:4-8。  
1994 開拓多種族風貌的台灣文學，文學台灣9:10-14。
- 鄭炯明  
1987 我的詩路歷程，文學界23:4-14。
- 鄭炯明等  
1994 把台灣人的文學主權找回來 台灣文學主體性座談會，文學台灣11:93-136。
- 劉登翰  
1990 大陸台灣文學研究十年，台灣文學觀察雜誌1:58-67。  
1995 台灣文學隔海觀 文學香火的傳承與變異，台北：風雲時代。
- 鍾肇政  
1989 台灣文學之鬼 葉石濤，台灣春秋8:314-337。
- 謝里法  
1994 台灣美術生態分析，文學台灣11:40-47。
- Aberbach, David  
1997 Hebrew Literature and Jewish Nationalism in the Tsarist Empire, 1881-1917.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3(1): 25-44.
- Bates, Daniel G.  
1994 What's in a Name? Minorities, Identity, and Politics in Bulgaria. Identities 1(2-3): 201-225.
- Bourdieu, Pierre  
1985 The Social Space and the Genesis of Groups. Theory and Society 14:723-44.
- Breuilly, John  
(1994) 1996 Approaches to Nationalism. Pp.146-174 in Mapping the Nation, edited by Gopal Balakrishnan. London: Verso.
- Calhoun, Craig  
1993 Nationalism and Ethnicit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9:211-239.
- Chang, Mau-kuei Michael  
1996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and Ethnization of Politics in Taiwan. Pp.135-152 in Taiwan an der Schwelle Zum 21 Jahrhundert Gesellschaftlicher Wandel Problem und Perspektiven eines Asiatischen Schwellenlandes, edited by Guter Schubert and Axel Schneider. Hamberg, Germany: Institute fuer Asienkunde.
- Cornell, Stephen and Douglas Hartmann  
1998 Ethnicity and Race: Making Identities in a Changing World. Thousand Oaks, CA: Pine Forge Press.
- Duara, Prasenjit  
1993 Provincial Narratives of the Nation: Centralism and Federalism in Republican China. Pp.9-35 in Cultural Nationalism in East Asia, edited by Harumi Befu.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Eley, Geoff, and Ronald Grigor Suny

1996 Introduction: From the Movement of Social History to the Work of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Pp.3-37 in *Becoming National: A Reader*, edited by Geoff Eley and Ronald Grigor Sun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merson, Ralph W.

( 1837 ) 1929 *The American Scholar*. Pp.25-36 in his *The Complete Writings of Ralph Waldo Emerson*. New York: WM. H Wise & Co.

Eriksen, Thomas H.

1992 *Us and Them in Modern Societies: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in Mauritius, Trinidad and Beyond*. Oslo, Norway: Scandinavian University Press.

Foucault, Michel

1972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New York: Pantheon.

Gellner, Ernest

1983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Gross, M.

1981 *On the Integration of the Croatian Nation: A Case-study in Nation-building*. *East European Quarterly* 15(2):209-225.

Hann, Chris

1995 *Intellectuals, Ethnic Groups and Nations: Two Late-twentieth-century Cases*. Pp.106-128 in *Nations of Nationalism*, edited by Sukumar Periwal. Budapest: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Hobsbawm, Eric

1983 Introduction: *Inventing Traditions*. Pp.1-14 in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edited by Eric Hobsbawm and Terence Ranger.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9: Programme, Myth, Reality*.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roch, Miroslav

1985 *Social Preconditions of National Revival in Europ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Social Composition of Patriotic Groups among the Smaller European Nations*. Trans. by Ben Fowkes.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93 ) 1996 *From National Movement to the Fully-formed Nation: The Nation-building Process in Europe*. Pp.78-97 in *Mapping the Nation*, edited by Gopal Balakrishnan. London: Verso.

Hsia, C. T.

1971 *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Second Edi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Hsiao, A-chin

1998 *Crafting a Nation: Contemporary Taiwanese Cultural Nationalism*. Dissertation o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Hutchinson, John

1987 *The Dynamics of Cultural Nationalism: The Gaelic Revival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Irish National State*. London: Allen & Unwin.

Kellas, James G.

1992 *The Social Origins of Nationalism in Great Britain: the Case of Scotland*. Pp.165-186 in *The Social Origins of Nationalist Movements: The Contemporary West European Experience*, edited by John Coakley. London: Sage.

Martin, Denis-Constant

1995 *The Choice of Identity*. *Social Identities* 1(1): 5-16.

McGrew, Anthony

1992 *A Global Society?* Pp.61-102 in *Modernity and its Futures*, edited by Stuart Hall, et al. Cambridge: Polity Press.

Penrose, Jan

1995 *Essential Constructions? The 'Cultural Bases' of Nationalist Movements*.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1(3): 391-417.

Royce, Anya Peterson

1993 *Ethnicity, Nationalism, and the Role of the Intellectual*. Pp.103-122 in *Ethnicity and the State*, edited by Judith D. Toland.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Publishers.

Smith, Anthony D.

1986 *The Ethnic Origins of Nations*. Oxford: Blackwell.

1989 *The Origins of Nations*.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12(3):340-367.

1991 *National Identity*. Reno, NV: University of Nevada Press.

1993 *The Nation: Invented, Imagined, Reconstructed?* Pp.9-28 in *Reimagining the Nation*, edited by Marjorie Ringrose and Adam J. Lerner. Bristol, PA: Open University Press.

Woodward, Kathryn

1997 *Introduction*. Pp.1-6 in *Identity and Difference*, edited by Kathryn Woodward.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Woolf, Stuart

1996 *Introduction*. Pp. 1-39 in *Nationalism in Europe, 1815 to the Present: A Reader*, edited by Stuart Woolf. London: Routledge.

Yoshino, Kosaku

1992 *Cultural Nationalism in Contemporary Japan*. London: Routledge.

Yuval-Davis, Nira

1997 *Gender and Nation*. London: Sage.

[〔台灣文化民族主義的發展〕](#) (蕭阿勤)

[〔政黨認同的世代差異〕](#) (吳乃德)

[〔出生時平均餘命的長期趨勢〕](#) (陳寬政、劉正、涂肇慶)

[〔公營事業私有化符合誰的利益?〕](#) (張晉芬)

[〔女子髮廊中的雜誌閱讀行為〕](#) (林鶴玲)

[〔一條畫不清的界線〕](#) (李國偉)